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6月30日第14期 总第258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258 期

### 【专稿】

姜成洋 风中的呐喊

——一位公社干部的内心世界（1958—1970）

附：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 年 6 月 19 日）

### 【红色文化】

余汝信 军队的造神运动

啟 之 火药味——战争语言漫笔（一）

### 【何與懷評論】

何與懷 且看两个“五四”人物的人生

何與懷 从老子被穿越“煽颠”谈起

### 【序跋】

王克明 记住本色的陕北往事——为《精魂》序

印红标 思想独立，温故知新——不平著《文革孽文集》序一

丁 东 文革民间思想的珍贵文献——不平著《文革孽文集》序二

### 【书讯】

学 斋 不平著《文革孽文集》（上下）在美国出版

### 【文摘】

刁晏斌 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其研究：词语的潜隐

### 【读者来信】

1. 郭予庆更正 2. 林洛纠错

3. 读者谈 257 期封面——“绊脚石”的设计

4. 越人对《大抓“五一六”的来龙去脉》一文的不同看法

【专稿】

## 风中的呐喊

——一位公社干部的内心世界（1958—1970）<sup>1</sup>

姜成洋

**摘要：**长期以来，对“大跃进”及其后续影响的认知，学界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即便涉及微观，也多是群体的行为呈现，鲜有系统的体现个人命运、观念波动的故事。人们往往想到群体无理性、乌合之众等概念，并借此想象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看到发自肺腑的群体欢腾，也看到了顺应时势的政治演出，但似乎忽略了为数不多的呐喊者。相对而言，他们保持了理性与常识认知，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发出质疑。他们个性耿直，也往往因此命运坎坷。就此而言，丁志伟的个案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它呈现了当时基层干部的心态史料，因此有助于从基层干部的个体视角理解那个时代。

**关键词：**大跃进；浮夸；舟山；公社干部；心态

### 一 一份报告

\* 2018年3月，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唐云先生告知笔者丁志伟的故事，并协助联系获取史料，谨致感谢。关于丁志伟的材料，由其三弟丁士杰复印提供，包括《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和平社大队搞浮夸材料》1958年12月、《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年10月27日、《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揭露舟山地委书记崔晓东材料》1962年12月9日、《给胞弟丁世忠的信》1963年4月27日、《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事实证明材料——共产党员周庆杰作证材料》1963年5月15日、《历史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张雨调查材料》，1963年5月31日、《舟山地委监委报告记录处理意见》196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报告》1963年8月12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时间不详、《给刘澜涛书记并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时间不详、《给安子文、刘澜涛二位中央首长并中共中央监委的信》时间不详、丁士杰与丁志伟往来信件若干（1962年至1965年）、《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9月8日、《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年4月2日、《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对丁志伟同志问题复议复查情况报告的批复》1983年6月4日、《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在鉴别史料真实性的过程中，我曾困惑于不同材料手迹的差异，主要问题是《反浮夸风报告》与丁志伟其他信件字迹不同。我对这份报告是否出自丁志伟之手表示怀疑，起码文字的抄写有可能另找了他人。丁士杰告诉我，大哥担心自己的手迹潦草难辨，给中央、省领导带来阅读困难，为此曾花时间练习工整的楷书。至于其他材料为何潦草，原因是丁志伟发送信件后，会抄写保留底稿，因为底稿不示他人，故而抄写迅速，为日常字迹。

1960年6月的一天，浙江舟山一位公社干部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并非正式公文，而是私下起草，陈述了这位年轻干部对时局的看法。他期待这份报告传到县委、省委，甚至转达中央，让毛主席亲自看到。由于担心字迹潦草，他还专门练习用工整的楷体书写。<sup>1</sup>

这份报告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大跃进”的“浮夸风”。起草报告是一个写满焦虑的过程，这使草稿上留下诸多反复修改的痕迹。起草者的内心不无困惑，他反复问自己：“要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要坚持真理还是随大流？”<sup>2</sup>他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外面喧嚣的世界让他隐隐感到孤独。他很犹豫，不知该不该把这份报告发出去。

6月18日晚，他观看了一出名叫《孙安动本》的柳子戏。这个戏剧当时风靡中国，讲的是明朝一位地方官为民请命，惨遭冤屈的故事。戏台上，角色孙安声音颤抖，充满怨愤：

含愤怒问苍天，方才你可亲眼见，是非曲直尽颠倒，浑浊不分忠与奸，为什么黎民无辜遭涂炭，老贼逍遥玉阶前，为什么万岁偏把奸臣宠，拒纳忠谏听谰言……

这位干部很快陷入戏曲情境中，戏台上颤抖呐喊的人仿佛不是孙安，而正是自己。他或许联想到“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饥饿，想到对自己打击报复的南下干部，想到自己无比敬仰的毛主席。现实与历史竟会如此相近。或许受到戏剧感动，他坚定了信念，准备第二天将报告发送出去。<sup>3</sup>他在心里为这份报告起了个名字——《反浮夸风报告》。

这个人名叫丁志伟，原名丁士华，1931年出生于浙江舟山，是当时舟山白泉公社的党委组织委员。<sup>4</sup>起草报告的时候，中共刚刚发起新“三反”运动。与几年前一样，这场运动反的也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8年夏天，中共发起旨在赶超苏联的“大跃进”运动。<sup>5</sup>毛泽东相信，人的意志可以影响工农业生产。他默许了上下脱离实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

<sup>1</sup> 丁士杰（1940年—），2018年4月2日电话访谈。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3</sup> 丁士杰（1940年—），2018年4月3日电话访谈。

<sup>4</sup> 1953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成立舟山专区，下辖定海、岱山、普陀和嵊泗（从江苏省松江专区划入）4县。1958年10月4日，舟山撤地建县，定海、普陀、岱山、嵊泗4县合并建立舟山县。1962年5月，舟山县被撤销，恢复舟山专区。1967年，舟山专区改称舟山地区。载《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4、45页。

<sup>5</sup> 虽然从口号来看，中共发动“大跃进”是为了赶英超美，实际上，它暗中将苏联作为自己追赶的对象。可参见沈志华：

希望全国人民趁着这股热劲，尽快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但这股热情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从1959年开始，各地陆续出现闹饥荒事件，农村干部和社员的关系也渐渐紧张。1960年这次“三反”运动，一个重要目的正是“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sup>1</sup>

丁志伟对这次“三反”运动充满期待，他在报告里写道：“浮夸是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更应该下决心，乘这次新三反之东风，火烧这个怪东西，拿起实践论、矛盾论的犀利武器，介（解）剖一下浮夸的真面目。”<sup>2</sup>丁志伟所说的浮夸，正是各行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这年年底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浮夸被中共列为“五风”之一。<sup>3</sup>但在丁志伟写报告的时候，浮夸还没有受到中共高层足够重视。但百姓和基层干部体会深切。丁志伟对浮夸的忧心或痛恨，既源于一位基层干部的忧民情怀，也因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遭遇了不公对待。这次不公与舟山“大跃进”的落实有关，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故事，不妨先从丁志伟的早年经历说起。

## 二 早年经历

丁志伟1931年出生在浙江舟山，祖辈是从福建逃荒过来的船工，几代人都靠海上摇船度日。到了丁志伟父亲这一代，他们定居的村庄兴起了手工酿酒业，全村37户人家，有27家靠手工酿酒谋生。丁家当时经营了“天吉”酒场，人手不够时，会雇用四、五人帮忙干活。酒场年产达到300缸左右（一缸950斤），这个规模在当地是中上水平。除此之外，丁家还合股经营了一家货行，丁父担任该行经理。还合伙开了一家瓦冰场（储备冬天冰块，以备夏天使用），资金6000元，丁家占1000元。当然，丁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农事生产。他家有1.3亩土地，同时与丁家同代兄弟共有宗田15亩，轮流耕种，所获归己。但因为

---

《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亦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sup>1</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3</sup>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77—387页。

16年才轮一次，因此平均算下来，一家分的宗田还不到一亩。<sup>1</sup>

丁家生活渐有起色，然而世事多舛，中日两国很快爆发了战争。1939年，日军攻占舟山定海，屠杀了上百居民。<sup>2</sup>这年6月23日，丁志伟的父亲为了抵抗破门而入的日军，被活活刺死。丁母忧劳成疾，几年后也病逝。在此期间的某段日子，丁志伟本人也险些遇害。他遭遇的是海盗绑票，被关在海盗小船的甲板下面。是丁家亲朋凑了不少钱，才把这个孩子



子保了下来。动荡岁月不仅危及人的生命，也让丁家几代积累的财产化为灰烬。年少的丁志伟经历失去双亲的痛苦后，不得不为糊口奔波。毕竟他有两个年幼的弟弟，身为大哥，他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左图 丁氏三兄弟：左起丁士忠、丁志伟（丁士华）、丁士杰

1946年，14岁的丁志伟初中辍学后，被堂叔带到上海，在留兰香糖厂当徒工，一干就是三年。这四年，丁志伟的生活想必艰辛，上海表面的繁华与一个徒工的辛酸，使渐入成年的丁志伟体会了人世苍凉。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对比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混乱，解放军秋毫不犯的气象给丁志伟留下深刻印象。共产党带来了和平局面，或许这也让他想起了中日战争的惨烈，想起失去的父母以及自己年少被绑的遭遇。这些亲身经历的今昔对比，使丁志伟下定决心，今后跟着共产党干事业。<sup>3</sup>

1950年5月，共产党军队解放了浙江舟山。<sup>4</sup>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前，从舟山抓走不少青年壮丁，这种行为无疑增添了舟山人对国民党的愤恨。<sup>5</sup>丁志伟躲过了这次抓丁，此时他已经从上海返回老家种田。他是在一年前运送糖时被车撞伤了腿，随后被糖厂解雇的。共产党解放舟山后，随即派干部领导土地改革。由于丁家的主要财产在中日战争中毁于一旦，按照土地的拥有数量来算，他们在土改中被划成贫农成分。<sup>6</sup>因为舟山是东海之滨的群岛，因此原本就没有太多可耕种的土地。而领导土改的多是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或许因为舟

<sup>1</sup>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

<sup>2</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sup>3</sup> 丁士杰（1940年—），2018年5月7日，舟山访谈。

<sup>4</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sup>5</sup> 《定海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sup>6</sup>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

山的情况与山东差距太大，他们在土改中很难找到典型的地主，因此他们把斗争对象放到了斗土匪、恶霸上。舟山的群众或许从没见过这种情景，无论如何，共产党带来了和平局面，它的政策赢得了多数群众好感。<sup>1</sup>

划成贫农成分，意味着在乡村生活中会有诸多政治便利。因为在共产党的政策中，贫下中农是可以依靠的主体力量。无论丁志伟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此时已经萌生了对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上海的生活培养了他不断学习的好习惯，他开始自学马列经典。大概就在这段时间，丁志伟改了名字。受到共产党信念的鼓舞，也受自己阅读的马列经典影响，他认为人须树立伟大志向，于是不再使用原名丁士华，而改用丁志伟。<sup>2</sup>丁志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sup>3</sup>，这意味着他的出身、信念和好学精神都受到组织认可。实际上，中共解放浙江之后，确实很重视赢得年轻人支持。<sup>4</sup>丁志伟似乎看到了干事业的机会。

丁志伟入党时，正赶上全国农业合作化开始阶段。整个浙江省的合作化开展很迅速，其中当然不乏虚假汇报。比如1952年临安县委第一书记因为虚报受到处分，曾给丁志伟留下深刻印象。<sup>5</sup>地方干部的虚报或许是个普遍现象，合作化运动在此后数年也越搞越快，浙江一度成了全国合作化最快的省。<sup>6</sup>虽然其间因为急躁倾向，浙江曾受到中央批评<sup>7</sup>，但1955年毛泽东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后，浙江合作化又变得非常迅猛。<sup>8</sup>

丁志伟在这段时间负责什么职务，我们并不清楚。但鉴于农业合作化是此时的重点工作，而丁志伟又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此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当地合作化的执行工作。这几年合作化的政策波动，或许使他对基层干部的责任和处境有了些切身体会，大概也会

<sup>1</sup>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11–112.

<sup>2</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sup>3</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sup>4</sup>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12.

<sup>5</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6</sup> 《中央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在浙江的讲话》，1955年4月5日，载《沙文汉工作笔记：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25页；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sup>7</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7、321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页。

<sup>8</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04、406页。

让他意识到，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干事业是个充满曲折与艰难的过程。

### 三 跃进与浮夸

中共执政初期，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中，农业合作化很快在全国展开。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迎来高潮，全国多数农民加入了合作社，且形式上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但毛泽东并不就此满足，他有进一步建大社的想法，认为大社便于大机器使用，便于大规模经营。<sup>1</sup>于是1958年夏天，全国兴起建人民公社的热潮。人民公社包括工、农、商、学、兵，特点是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与此同时，中共发起“大跃进”运动，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sup>2</sup>

舟山也响应政策，在所辖一千多个岛屿上建起26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岛一社，小岛是多岛一社，大岛是一岛多社。<sup>3</sup>公社分成不同管理区，管理区包括不同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舟山的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四季分明、冬暖夏凉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满足了当地一年至少两季的水稻生产。<sup>4</sup>早稻通常4月底种，7月底收。晚稻大约9月种，10月底收。

1958年下半年，舟山也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全民炼钢，村村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丁志伟也参与了炼钢，担任定海县第一钢铁厂副厂长。这个过程中，他很可能受到全民跃进的氛围感染。作为一名有上进心的基层干部，“大跃进”的工作方式或许让他感到新奇。这段时间，舟山传达上级指示，工作方法上强调全面务虚，先虚后实，以实论虚。<sup>5</sup>基层干部对此理解，就是以统计指标刺激生产。刺激手法多种多样，通常强调先解放思想，然后开展挑战赛、摆擂台等形式，提出决心书、保证书，鼓足干劲，搞好统计工作。<sup>6</sup>

先虚后实在农业上的体现，便是放高产卫星。当时，舟山紧跟全国形势，已经放出了

<sup>1</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11页。

<sup>2</sup>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4—168、212—216页。

<sup>3</sup>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情况的报告》，1958年10月10日，舟山市档案馆5-6-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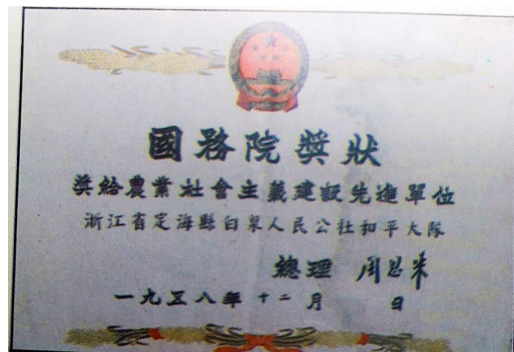
<sup>4</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

<sup>5</sup>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全区第二次公社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舟山市档案馆5-6-27-1。

<sup>6</sup> 《利用统计资料，大搞评比竞赛》，载《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第一辑，中共定海县委办公室编，1958年12月，第23页。



一些农业高产卫星。最典型的是白泉公社和平生产大队，这是1958年县委副书记亲自蹲点的大队，可能也是白泉公社基础条件最好的大队。这年和平大队上报的水稻亩产2075.45斤，通常情况下，早稻平均亩产有500多斤，晚稻平均亩产300斤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平均每亩年产不到1000斤。因为上报的产量较1957年有大幅增长，它被评为1958年全国



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大队得到由周恩来总理签名的奖状，大队干部也受到奖励，获得前往北京参观的机会。<sup>1</sup>

左图 白泉公社和平大队获得的先进单位奖状，图片来自《白泉镇志》

和平大队声名鹊起，或许会刺激其他生产大队的热情，但也很可能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困惑。人们早就听说过，和平上报的不是真实产量。或许因为县委副书记亲自蹲点，和平大队的浮夸想必获得了潜在支持。在这种氛围中，其他大队的生产也多有浮夸。这年晚稻收获后，县委在一次大会上做了统计，显示1958年粮食平均亩产1080斤，早稻最高亩产4383斤，晚稻最高5529斤。<sup>2</sup>这些数字显然超出了舟山农民的认知，因为长期以来，这里的早稻亩产仅有500多斤。包括丁志伟在内的基层干部之所以感到为难，一方面因为产量浮夸意味着上级征购粮食增加，另一方面，各公社号召社员敞开肚皮吃食堂，撑了不到半年，就出现粮食告急的局面。丁志伟或许不无困惑：应该怎么理解先虚后实，以实论虚？

这种困惑不光基层干部有，1958年底，“大跃进”的浮夸和各地粮食告急情况为高层所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尝试纠正左倾。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响应中央号召，在年底省委的几次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浮夸、不虚报。<sup>3</sup>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反思，舟山在年底开始搞起整社试点工作，目的是建立几个样板，以便更好地推动下一年工作。

<sup>1</sup> 《和平社是怎样领导大面积丰产田运动的？》，载《农业生产大跃进经验汇集》第一辑，中共定海县委办公室编，1958年12月，第7页。

<sup>2</sup> 《跃进中的舟山群岛》，1958年12月15日，舟山市档案馆5-6-101-1。

<sup>3</sup> 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1958年底，舟山选定白泉公社和其他四个公社做试点，从地委、专署机关抽调67名干部，组成9个工作队，下去帮助开展整社试点。<sup>1</sup>丁志伟是在1959年2月参与其中，他被调到白泉公社，主要负责党委组织工作。<sup>2</sup>调到白泉公社后，丁志伟随后被安排到下属的金星生产大队，负责指导这里的农业生产。丁志伟或许意识到，这是一次施展身手的机会。

丁志伟被安排到金星大队时，正值早稻播种时节。于是他向白泉公社领导提出请求，发起一次农业生产竞赛，挑战的对手正是声名鹊起的和平大队。丁志伟提出“学和平，超和平”的口号，他想通过发决心书的形式，掀起一个“学赶超帮”运动，推动全社粮食生产。<sup>3</sup>当然，他要赶超的不是那个虚报产量的和平，而是想靠实实在在的产量去竞赛。既然上级强调不浮夸，不虚报，年轻的丁志伟就有信心发起挑战。

丁志伟发起竞赛的决心受到公社领导肯定，但他们似乎不看好金星向和平发起的挑战，理由很简单，两个生产队的基础条件有差距。和平大队之所以成为县委副书记蹲点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条件好，主要是土质好。但丁志伟认为：“事在人为，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大作用，同样的客观条件超过和平，不能说服人，客观条件差超过和平，才能破除人们的迷信。”<sup>4</sup>丁志伟的论证充满辩证意味，这很可能是他自学《毛泽东选集》的体悟。无论公社领导如何表态，丁志伟竞赛的决心不改变。

转眼到了早稻收获时节，为了推动产量上报工作，舟山县委公布了早稻亩产800斤和1000斤生产队的奖励办法。<sup>5</sup>看得出来，相比于1958年下半年的浮夸，此时的粮食指标虽仍超出现实，但已经收敛了若干。

一天，白泉公社的魏书记找到丁志伟，问他负责的金星大队亩产多少。丁志伟说700斤左右。魏书记说：“看（舟山县）领导的意思，是叫我们搞800斤公社，你觉得怎么样？”丁志伟回答：“实事求是好了，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叫我们讲真话，我们要吸收五八年教

<sup>1</sup>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全区第二次公社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舟山市档案馆5-6-27-1；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6页。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3</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4</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5</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训，谭震林同志的放开肚皮吃饱饭，是我们浮夸造成的，虚报成绩要犯错误。”

魏书记对丁志伟的谨慎不太满意，他不用中央纠左精神说事，而是用身边的例子给自己证明。魏书记说：“1958年县委艾衍笃副书记在和平搞重点，搞出双千斤队（按：早稻千斤，晚稻千斤），实际产量他又不是不知道。”魏书记的意思很明显：谁都知道现在搞浮夸，但大家心照不宣，就这么个形势。

魏书记是南下干部，来自山东莱芜，他提到的艾副书记也是山东莱芜人。<sup>1</sup>1949年，当共产党在山东战区取得作战胜利后，山东分局抽调了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解放南部中国。<sup>2</sup>其中，来自鲁中南地区的3680名干部被分配到浙江，接管省、市、县三级政权。<sup>3</sup>接管舟山的这批共产党干部，大部分都来自山东莱芜。他们被安排在舟山地、县、公社各级。

魏书记在舟山的工作或许并不顺利，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的隔阂是个普遍问题。由于来自革命老区，经历过激烈的土改和战争洗礼，农民出身的南下干部难免形成这种意识：贫农占领国家，管理国家。同时，华东局在组织对他们的培训时，也强调他们在全国革命胜利中的贡献，无形中培养了南下干部的领导意识，而在当地人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傲气。<sup>4</sup>除此之外，南下干部明显的外地口音，以及饮食和出行上的不同习惯，被他们自己看成革命特征，但在当地人眼中，却被视作缺少文化修养的表现。这种文化习俗上的隔阂，使得远离乡土的南下干部感受到情感上的冷漠。<sup>5</sup>因此，魏书记与本地干部无形中有些情感隔阂，这进一步催生他按照上级命令行事的思维，毕竟县委主要领导也是莱芜的南下干部。<sup>6</sup>

当然，魏书记默许浮夸，可能也是联想到浙江前几年农业合作化的经过。当时浙江一

<sup>1</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5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抽调一万五千干部随军南下任务执行情况的补充报告》，1949年4月29日，载《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十二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393页。

<sup>3</sup> 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组织史（1949.6—1950.5）》，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1989年，第3—4页。

<sup>4</sup>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8, 51.

<sup>5</sup>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07.

<sup>6</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44页。

哄而上，在全国一马当先。后来中央根据不同地区的进度差异，制定了“停、缩、发”指示，浙江发展得太快了，被要求砍社。<sup>1</sup>1955年上半年，中央农村工作部警告浙江“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浙江负责的干部不得以做出反思，承认省内合作化运动“不能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而是冒进的”。<sup>2</sup>

但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讽刺这位中央农村工作部长畏手畏脚，总是担心合作化走得过快。<sup>3</sup>毛泽东的态度给前不久决定压缩规模的浙江省带来转机，省委乘时乘势，立马又做自我批评，只不过这次不再批评“急躁冒进”，而是批评“坚决收缩”，并自嘲这个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被“胜利吓昏了头脑”。<sup>4</sup>

政策浮动给基层干部带来两难困境，一旦前期执行政策比较冒进，他们之后便不愿接受上级的收缩调整，这不只关系他们在群众中的颜面，也因为先前一哄而起，随后紧急收缩，工作难度很大。<sup>5</sup>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基层干部自然学会了揣摩顶上意图。所以，当1958年的浮夸受到纠左批评时，机敏的干部或许会做出联想，并预感到此后一段时间的形势。

丁志伟似乎没有这么敏感的意识，毕竟他只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干部。自学马列、熟读毛选的他更认准实事求是这条原则。实际上，1959年金星大队早稻亩产600多斤，相对于500多斤的平均亩产，丁志伟负责的金星大队产量已经不错了。<sup>6</sup>而丁志伟决定上报700斤，大概也是在浮夸形势与实事求是之间取了个平衡，即上报的稍微多点，但不能离谱。丁志伟之所以不愿上报高产量，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报的高，上级征的粮食就多。“大跃进”搞了一年，人们似乎从最初的狂热中清醒了。农民挨饿不是个别现象，许多基层干部

<sup>1</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页。

<sup>2</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7、321页。

<sup>3</sup> 关于毛泽东与邓子恢的争论，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60页。

<sup>4</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04、406页。

<sup>5</sup> 《中央农村工作部杜润生在浙江的讲话》，1955年4月5日，载《沙文汉工作笔记：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30页。

<sup>6</sup> 丁士杰（1940年—），2019年5月5日，电话访谈。

左右为难，开始瞒产私分了。舟山虽然挨饿不严重，但干部瞒产私分的情况也出现了，“过去是越叫富越好，现在是越叫穷越好”。<sup>1</sup>当然，丁志伟并不赞同瞒产私分的做法，如同他不赞成浮夸虚报一样。<sup>2</sup>无论出于哪种考虑，丁志伟上报的700斤，在公社干部看来都太谨慎了。

没过几天，白泉公社召开党委会议，讨论早稻亩产上报问题。本地干部徐社长也问丁志伟产量的事，丁志伟仍说报700斤。丁志伟的谨慎显然让公社主要干部不满意，徐社长当场说了句激将话语，听起来却不无嘲讽意味：“不要唱低调，小小金星不超和平吗？”丁志伟自然品出话语的个中意味，毕竟自己半年前喊出了“学和平，超和平”的口号。他回答：“实事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固有风格，超不超和平，看今后分配产量好了。”丁志伟这个反驳一下激怒了徐社长，他在大会上不指名地说了句：“党委会个别成员思想意识不好，挖社会主义墙角。”<sup>3</sup>

丁志伟在上报产量上的固执，似乎影响了整个公社的评选。即便白泉公社其他大队上报了高产量，因为金星大队不够800斤，可能使公社整体上不达指标，白泉公社没有在全县评上800斤公社，没有得到县委任何政治上、物质上的奖励。因为这件事，丁志伟在公社干部中印象受到影响。<sup>4</sup>

1959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正是晚稻种植时，舟山县委连续召开三级、四级、五级干部会议。紧密的会议预示着形势又有新变化。原来，在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泽东决定发起反右倾运动，对“大跃进”的质疑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努力被迫扭转。转变来得挺突然，却很可能应验了一些基层干部私下的形势预判。

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一系列会议中，舟山全县有1373名干部被视作“右倾”、

<sup>1</sup> 《王裕民同志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记录》1959年9月19日，舟山市档案馆6-1-74-3。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3</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4</sup> 丁士杰（1940年—），2018年5月7日，舟山访谈。

“白旗”，受到批判。<sup>1</sup>其中点名批判51人，这些人涵盖了不同级别的干部，既有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又有党委委员、管理区书记及生产队支部书记。受批判的原因包括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八字宪法等。<sup>2</sup>

自然，在这次反右倾运动中，丁志伟也成了受批判的对象。他先前上报产量的谨慎，显然与“大跃进”精神不符。当然，很难判断丁志伟是否成为重点揭发批判的人物。但他受批判的原因大致是明确的，他的主要问题被归纳成“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指在先前工作中，他对领导安排的某些事情不满，或许先前早稻产量的分歧，就被视作“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在与公社干部辩论时，丁志伟或许流露了一些孤傲神情，这大概掺杂了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情感隔阂，却也多少反映出丁志伟的耿直性情。<sup>3</sup>

丁志伟试图用自己认为的真理说服公社领导，而公社领导则认为丁志伟在跟党唱对台戏，显然，领导们把自己看成了党的代表，尤其考虑到政策落实来自上级领导意图。丁志伟并不认同这种批判，一方面，他不认为干部们代表共产党，在他心中，说真话才能代表共产党。另一方面，或许他也认为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和资历，丁志伟曾不时透露过内心的骄傲：“《毛选》四卷我通读过四遍，我佩服毛主席，也相信毛主席。”<sup>4</sup>

丁志伟这种执拗的性情显然不受干部欢迎。1960年1月，舟山县委为了新一年工作“开门红”，布置各公社开展内部干部整风活动。白泉公社1月1日开始整风。由于先前上报早稻产量发生过不愉快，加之近期赶上了反右倾和干部整风，在白泉公社内部会议上，丁志伟自然成了重点接受帮助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帮助丁志伟，白泉公社在干部整风之前，特地制作了一份材料，列举了丁志伟的“个人主义”表现。可以想见，在公社内部的整风活动中，丁志伟一定承受了不少思想压力：自己反对浮夸，却被说成右倾，而那些响应浮夸号召的人，此刻却一本正经，从思想上对自己进行帮助。

丁志伟不是轻易服输的人，二十九岁的他正处在血气方刚、思想独立的年龄段，他决

<sup>1</sup> 《中共舟山县委四级干部大会情况简报 思想动向第八期》，1959年10月14日，舟山市档案馆 6-1-125-8。

<sup>2</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sup>3</sup> 《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

<sup>4</sup> 丁士杰（1940年—），2018年5月7日，舟山访谈。

定做些反抗。1960年3月，丁志伟不服批判，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带走了这份“个人主义”的材料。这件事引起公社主要干部不满，他们一定会把这种不打报告、私拿材料的行为，看成无组织、无纪律的体现，也更验证了丁志伟是“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的人。丁志伟可能料到了这种不满，但他无法预料自己的意气会引起多大风波。

拿走材料后的某一天，丁志伟回家后发现屋里有些异常，他感觉自家的床、帐席、衣柜、书桌有被翻动的痕迹。他从邻居口中探得消息，好像公社派人来找过他。丁志伟预感到一定是因为自己私拿材料，公社派人搜查过自己的住处，还翻了自己的工作生活笔记。<sup>1</sup>与此同时，丁志伟听说县委原计划提拔自己做农工部副部长，但后来又没动静了。

#### 四 写报告的心态

舟山六月的夜晚，凉风习习，农人劳作一天，结束晚上的集体开会后，终于可以放松身心，缓解一天的疲惫。丁志伟却难有放松身心的闲情，他端坐书桌前，奋笔书写着一些文字。他酝酿好几天了，或许也已经动笔数日。丁志伟内心充满苦闷彷徨，思绪纷飞，却也不无混乱。他不时用笔做着圈点、勾画，显然，他在酝酿如何更好地表述自己的想法。

丁志伟写完时，已经形成一份长达四千余字的报告，这时，私拿材料的风波已经酝酿三个月了。这三个月丁志伟过得并不平静，因为自己的耿直，他成了公社重点批评对象，又因为意气用事，他与公社领导的矛盾逐渐加深。从一年前上报早稻产量开始，丁志伟与公社领导的纠葛便已经产生。这一年不定期受到批评，促使他想写一份申诉报告，既反映自己内心的冤屈，又对这两年浮夸的氛围进行反思。他需要拿捏感情，使自己在申诉中接近道义。他也需要反复思辨，尝试用自学的马列经典、《毛泽东选集》去分析浮夸现实，找出浮夸原因，并发出纠正的呼吁。

丁志伟一个很大的困惑，是不知该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该坚持真理还是随大流。他渴

---

<sup>1</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

望人人讲真话，但经历一年的挫折后，他不得不承认讲真话需要勇气，更需要共产党的支持。<sup>1</sup>当他想起自己受到“和党唱反调”的批判时，便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话语：“我认为领导的话，正确的就是党的话，不正确不能代表党的话。”<sup>2</sup>显然，在丁志伟心中，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

或许在潜意识里，丁志伟和许多中国农民一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没问题，坏就坏在下面执行政策的干部。<sup>3</sup>但并不是所有农民都这么朴实，正如丁志伟已经发现的那样，“有的说共产党捡到一本说乱话的书，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相信。”<sup>4</sup>看起来，共产党执政十年后，尤其最近两年“大跃进”的浮夸泛滥，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已经受到影响。基层干部左右为难，对政策浮夸的体会更深。一位与丁志伟熟识的基层干部就意识到：“我们明知道县委和毛主席指示不对头，可是不敢向上级反映。”<sup>5</sup>

丁志伟思绪纷飞，不断穿梭于1959年与当下之间。经历这一年不顺后，他的一些观念发生了微妙变化，他或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也可能并不自知。比如1959年与和平大队搞竞赛时，自己相信事在人为，条件是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大作用。当然，那时他不愿应和风气，一起放高产卫星，在丁志伟心目中，如果把浮夸理解为发挥主观能动性，那就错了，主观能动也应建立在实实在在基础之上。此刻酝酿报告时，浮夸带来的危害已经让丁志伟深有体会，他写了一句“他们违反了客观存在不随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个唯物主义原则。”与一年前相比，此时丁志伟可能不再机械地理解主观能动性了。时间变化与自身经历为他增添了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书本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丁志伟并不想单纯书写自己的冤屈，而要上升到分析浮夸，发出呐喊的高度。当然他也清楚，自身的冤屈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他反复思考身边接触的人物，感到浮夸让人

<sup>1</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3</sup> 江华：《江华在浙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1页。

<sup>4</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5</sup> 《事实证明材料——共产党员周庆杰作证材料》，1963年5月15日。



变得虚伪，让人逢场作戏。但不同人在这场闹剧中表现不一样。想到这里，他把浮夸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不明确立标兵与讲真话的关系，不明白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立标兵应该建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上，而有的同志却曲解了先虚后实的含义。第二种是锦标主义，为了争先进，争光荣，吹嘘自己，不服别人，或者干脆骗取党的信任。第三种是工作没做好，担心影响自己地位而不择手段搞浮夸。第四种是看大势，随大流。<sup>1</sup>

写到这里，丁志伟不能不为党的未来忧心。十年之前，共产党接管上海、解放舟山的时候，人们怀着怎样美好的期待！仅仅十年，共产党内就开始形成一种虚伪氛围，逢人不说真心话，对党不讲忠诚话。尤其严重的是，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也受了损蚀，有人说共产党捡到一本撒谎的书，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相信……<sup>2</sup>

丁志伟尽量表达着自己的忧民情怀，但他似乎也隐藏了一些内心想法，或者说在起草报告过程中，他一直在拿捏表达的技巧。或许丁志伟清楚，自己这种性情的人只适合踏实干事，自己不愿弄虚作假，也没那套弄虚作假的本事。如果放任浮夸一直存在，那自己凭实干做出来的成绩，自然会遭到浮夸湮没。这种不公是自己无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如何处理同公社领导的关系呢？现在跟领导闹得有点僵了，丁志伟三番五次受批评，还很可能被干部派人搜了屋子，这一切纠葛的根源是1959年上报产量的事。明明自己有理，但能不能说公社干部打击报复呢？丁志伟很纠结，他写下这样一段模棱两可的话：“是不是他们打击报复呢？不是的，而是他们认为我不听他们的话，想压服我！我没有服！”什么叫压服呢？或许丁志伟想让别人认为这是以理服人，与打击报复不同。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吗？也许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只是一种策略，一方面丁志伟对这次三反运动抱有热情，他希望自己受的冤屈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一旦自己的问题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在未来的工作中，自己还需要与现在的领导打交道。

经历数个夜晚酝酿，这份四千多字的报告总算写好了。交到哪里呢？丁志伟心里一定

<sup>1</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sup>2</sup> 丁志伟：《反浮夸风报告》1960年6月19日。

清楚，只交到县委是不管用的，毕竟是公社和县委在批判自己，他们只能把报告压住。只有向省委甚至中央转发，自己的事情才能引起重视，浮夸的风气才可能止住。但这事风险挺大的，搞不好会跟公社和县里闹得更僵。丁志伟或许有打退堂鼓的时候，绞尽脑汁写出的报告，发还是不发，真是个问题。

6月18日晚，丁志伟萌生看戏的念头，或许这些日子心太累，看个戏曲调整心情。无论他是否是第一次观看《孙安动本》，这夜的柳子戏都足以引他共鸣。丁志伟很可能产生了时空恍惚的幻觉，戏台上的唱声咿咿呀呀，满是凄凉，时而传入他的耳朵，时而又是一片沉寂……

## 五 希望与顿挫

1960年11月，舟山县委召开会议，宣布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运动”。<sup>1</sup>中央之所以发动整风整社，因为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闹饥荒现象。中央认为基层干部出问题了，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疑虑，强调纠正干部群体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sup>2</sup>

对于“跃进”了两年多的舟山农民而言，中央整风指示拨云见日，他们对于干部“五风”早有怨愤。白泉公社先前传开了一个说法：“饿死和平，吃饱金星”。<sup>3</sup>说的正是虚报浮夸给农民带来的影响。基层干部则不无压力，先前顺着上级意思搞浮夸，眼看却变成了自己的罪过。丁志伟的心情更复杂，可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整风应验了自己的呼吁，或许这一次整风，能把已经泛滥的浮夸风狠狠刹住。但隐隐的忧虑袭上心头，丁志伟一定能感觉到，自己跟公社干部的关系更加微妙了。

县委传达中央指示时，丁志伟那份报告已经发出半年了。他并没有直接收到省委、中

<sup>1</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sup>2</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386页。

<sup>3</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央的回复，这使他半年的生活不无忐忑。但县委对这件事却反应强烈，在县级干部眼中，丁志伟越级上书，完全是对他们的无视。丁志伟或许盼望中央指示，渴望自己的真话得到共产党支持。但中央整风指示发出时，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大忌。他越能证明自己正确、直属上级错误，就越有可能遭到上级暗中报复。毕竟中央整风指示并不是对自己报告的直接回复，这意味着中央指示并不是保护自己的尚方宝剑，天高皇帝远，丁志伟或许隐隐感到了忧惧。

1961年4月，根据上级安排，丁志伟被送到舟山县委党校学习。<sup>1</sup>一方面，县委或许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不想把丁志伟的事情闹得太大。因为他们意识到，丁志伟的报告已经引起省委注意了。另一方面，县委有些领导觉得丁志伟能说能写，工作能力值得肯定，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有挽救的必要。因此，舟山县委干部希望利用党校学习期间，促使丁志伟思想上有个转变。<sup>2</sup>然而，丁志伟不愿在思想上屈服，依旧认为自己反浮夸是坚持真理。另外，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他想在“抄家”和“提拔农工部副部长”两件事上追究到底。省委的调查或许让丁志伟看到了希望。

省监委第一次调查似乎无果而终，大约1961年10月，省监委开始第二次调查丁志伟的事。丁志伟的事不断发酵，给他的情感生活也带来了波澜。这段时间，他正与嵊县城东中学一位姓卓的女教师恋爱，并计划在1962年春节完婚。丁志伟近来状态的起伏，一定让未婚妻感到了压力。于是，她给舟山地委（区划调整，由县级升地级）组织部写信，询问自己未婚夫的情况。

1961年10月27日，组织部给她所在的学校去信，内容简单而又不失冰冷。在这封信中，组织部给丁志伟这样定性：“丁志伟是一个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屡教不改、无理取闹分子，具体情况就不一一详告了。”组织部并建议学校“视情况和卓××谈一谈，作为她改变二人恋爱关系的参考”。<sup>3</sup>或许迫于政治、舆论压力，丁志伟与未婚妻的恋爱关系很快

<sup>1</sup> 丁志伟：《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

<sup>2</sup> 丁士杰（1940年—），2019年5月10日，电话访谈。

<sup>3</sup> 《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年10月27日。

终结。

丁志伟看到了组织部给城东中学的信，他通过什么渠道看到的，别人并不清楚。或许省监委开展第二次调查时，曾把这封信给他看过。他很可能并未经过任何人同意，看到信的原文后，迅速用潦草的字迹抄写了这封信件，作为未来申诉的证据。他发现信里写着这样一些文字：

丁志伟是一个党员，原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但是近几次帮助他不改变，而且借我们纠正五风的机会，捏造事实，攻击党委，到处告状伸冤，甚至于制造假象，陷害干部。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送他到地委党校学习好几个月，但结果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多方面攻击党校干部……

抄完信的原文后，丁志伟对里面提到的“到处告状伸冤”很是气愤，于是在纸页空白处写了一句备注：“在 61 年 10 月 27 日以前，我根本没有到处告状伸冤，只写了一封信给省委。”<sup>1</sup>丁志伟所说的这封信，可能正是不断发酵的《反浮夸风报告》。

经历了一年调查研究调整，中国整体上淡化了阶级斗争氛围。这让 1962 年的春节充满喜庆氛围，舟山百姓沉浸在阖家欢乐的喜悦中。这种气氛引得丁志伟格外落寞，按原本计划，他此时本该准备完婚的大事。这种落寞促使丁志伟做出决定，他要去北京申诉冤屈。

这是丁志伟第一次前往祖国首都。春寒料峭，北上的火车发出碰撞铁轨的“咣咣”声，声声入耳，如同一把重锤敲打心房的声音。丁志伟思绪纷飞，时空恍惚的感觉再次让他穿梭于现实与幻觉之间。或许他又想起了《孙安动本》的戏曲：

可叹这朝中事混乱不堪，难道说有忠心真无处用，官家只会害百姓，哪管你妻离子散死和生，怨恨声犹绕耳边，罢，五更天明再上殿，圣意不转誓不还……

<sup>1</sup> 《舟山地委组织部给城东中学党支部的信》1961 年 10 月 27 日。

“圣意不转誓不还！”丁志伟在漫漫旅途中想起了毛主席，他翻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开始给毛主席写信：

敬爱的毛主席并党中央：

您老人家工作很忙，不可能亦不应该看这封信。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表示为了争取真理的胜利，我将共产党员的权利、义务运用到最高程度，尽了最大的努力。真理能不能胜利，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取决于党的支持，依靠同志们共同坚持。

现在看来，真理是失败了……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比关汉卿写窦娥冤、孙安动本更动人的典型，特别是贯彻60条的今天，这场反五风斗争，历时五个年头，不能取得胜利。这个顶住共产风、浮夸风的同志，本身没有原则性错误，现在还被组织上当作“以顶风为名，拉拢坏分子，打击报复，并且说他是一个坏分子，已经开除了党籍”，写信给他未婚妻。为此，他的未婚妻提出介除婚约。本来他们在这次春节结婚，现在这个同志流落在火车上，渡过62年的春节。

坚持真理是要化代价的，可是化了代价，就要取得胜利为止。不胜利人家要怀疑党的政策。现在同志们议论纷纷，反映很大。这件事发生在祖国东部的舟山群岛。

这个同志为什么这样做！是对主席“有真理就要跟”“舍得一身剐”的一次大胆尝试。愿意做真理的奴仆，相信马列主义，没有什么私人的目的。

……

“坚持真理是要花代价的”，“真理失败了。”丁志伟在字里行间流露着心底的绝望。真理失败了吗？他此时还不想放弃，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咽不下这口气。舍得一身剐，丁志伟要来一次大胆尝试。

丁志伟的北京之行并没有什么效果。浮夸早就受到中央重视了，为此已经用一年时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丁志伟去北京时，中央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讨论如何解决征粮的困

难。<sup>1</sup>他很可能没有渠道见到事物缠身的各级领导。

坚持真理是要花代价的。丁志伟从北京返回舟山后，没多久就收到开除党籍的通知。在开除丁志伟党籍的问题上，舟山地委召开了不下四次讨论会。看起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挺谨慎，挺纠结，或许也不想让这个问题收到省委关注。

1962年4月17日，丁志伟写了一份《告党内同志书》。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想在舟山的党员群体中寻求道义支持。在这封公开信的开头，丁志伟便申明舟山群岛发生了比《窦娥冤》、《孙安动本》更动人、更典型的斗争。相比于《反浮夸风报告》，这封公开信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丁志伟开始毫无遮拦地表达对打击报复的不满，而在两年以前，起码从字面上来看，丁志伟认为领导不是对他打击报复。他写道：

这场斗争搞得全舟山干部都知道，只允胜利，不允失败，否则坚持真理还有什么信心呢？丁志伟要为党、为人民、为同志、为省委、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一定要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这是党赋予丁志伟的天职。组织原则是手段，追求真理是目的，冲破组织原则的限制，把这场斗争的真相揭开来，让同志们评一下……勇敢地站起来吧！顽强地战斗下去！<sup>2</sup>

虽说尚有胜利的希望，但丁志伟此刻分明有了骑虎难下的感觉。当年写《反浮夸风报告》时，他可能想不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既然已经越闹越大，索性越大越好。与《反浮夸风报告》不同的另一点是，这封公开信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叙述。丁志伟为什么用第三人称来记录自己呢？他大概想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表述自己承受的冤屈，同时，还可能想以第三者的口吻为自己的斗争鼓气。

丁志伟的处境很孤单，即便是自己的胞弟，也越来越不认同大哥这种斗争方式，尽管他们知道丁志伟在坚持真理。丁志伟的三弟丁士杰1960年考入在杭州大学，最初学化学。

<sup>1</sup> 参见张素华：《变局：中共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sup>2</sup> 丁志伟：《告党内同志书》，1962年4月17日。

到了1962年8月份，他向学校申请学习政治学。丁士杰改读政治专业的隐蔽目的，便是搞明白中国的政治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三弟的这种观念显然是受了大哥遭遇的影响。1962年9月3日，丁士杰从杭州给大哥丁志伟写信：

……一个人（少数人）不能挽回大局，我国的左倾和教条是一个历史的趋向。我国太穷了，我们的介（解）放战争胜利来得太快，从建国到57年的建设成就太大，干部来不及培养，中国农民的头脑只能支配黄牛和锄头。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的目标是光明的，方向是对头的，只是路线走弯了。我们付代价太大了，但必须是能叫人睁开眼睛看看现实。<sup>1</sup>

……现在社会上比较混乱，你斗争应加小心，在现在很难取得胜利。如果有适当机会就应把手，等自己到一定地位再争不迟。目前风左右摇摆，而且很厉害。我想从事政治工作，但在我国如此情况下很难起作用。在我国有才能和勇敢的政治家太少了，而一些政治乞丐和文化乞丐太多了。权力是政治的太上皇，有它就有一切。但中国目前权是高不可攀的，目前没有一个青年学会爬，只是伏在地上乞求和幻想……<sup>2</sup>

三弟的劝解并没有让丁志伟感到慰藉，或许冷静之后，丁志伟能体会到三弟的苦心，但此时丁志伟很难平静下来。三弟的劝解甚至让他感到愤怒，这种气愤伴随着着观念世界的孤独，一种连亲人都不能理解的孤独。

丁志伟遭受的顿挫接二连三。这年年底，舟山地委针对丁志伟的问题，做出了改划其家庭成分的决定。1950年土改时，根据土地拥有量做标准，丁志伟家被划成贫农。丁志伟能很早入党，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这种政治上优越的家庭成分。但此时，这些政治资本正在一点点消失。丁志伟的党籍已经被开除了，这次改划成分的决定，又让他的贫农家庭变成了手工业资本家。改划成分的理由是：丁家拥有大量的酿酒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

<sup>1</sup> 《丁士杰致丁志伟信》，1962年7月。

<sup>2</sup> 《丁士杰致丁志伟信》，1962年9月3日。

雇佣工人，取得利润；丁家1.3亩田和几年轮种一次的宗田，并非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丁家成员之中，无一人参加劳动，全靠剥削收入生活。根据政务院1950年8月4日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丙、政务院的若干新规定”第二项：“有多量手工工具、作坊、原料等资本，雇佣工人和学徒进行手工业生产，取得利润，作为收入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划为手工业资本家”。据此，1962年9月4日地委常委讨论决定，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为手工业资本家。<sup>1</sup>

从写出《反浮夸风报告》开始，丁志伟就不断写信为自己伸冤。到1963年4月，他已经写了大约一百万字，一千多封信。他七次上杭州，两次去华东，还特地去过北京。其间总共花去五百多元费用。<sup>2</sup>然而，伸冤的过程充满曲折，也始终看不到平反希望。舟山地委对他的一系列行为很反感，他们用明确态度表达了对丁志伟无理取闹的不满：

（丁志伟）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到处讲，今年5月在轮船码头上对陈××说：“现在我在打官司，到省委到中央去，娘希匹，这场官司打不赢不肯息。”陈说这样影响不好，劝他不要这样搞，他不理，还是高声地讲。在理发店门口向社员沈××也是这样讲，“和领导上打官司”，要别人给他写“抄过家”、“提拔他”的证明。由于人家不了解，都不给他写，并劝他“不要搞”，“是错误的”，他就批评他们是“胆小鬼”、“个人主义”。特别是房客洪××和……不给他写“抄过家”证明，他就翻脸和他们吵，几次威胁他们搬家，甚至骂，在他们孩子身上也大发态度。由于这样搞，在群众中都在讨论着“丁志伟在打官司”，有的群众因为不明白真相，就打听他打官司的事，影响很不好。<sup>3</sup>

省监委的态度虽然理性，但结论仍让丁志伟看不到希望。比如1963年5月，省监委曾派调查人员前来调查。调查员得出的结论是：

<sup>1</sup> 《关于改划丁志伟家庭成分的决定》，1962年12月1日。

<sup>2</sup> 丁志伟：《历史的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

<sup>3</sup> 《关于丁志伟同志申诉的调查报告》1962年7月24日



我在调查该案时，曾注意到这不是一般性的案件，而牵涉到原舟山县委和现舟山地委领导的问题，丁又处在“孤立”、“少数”的情况下，这一点，刘××同志在我未去舟山时曾再三指示过。因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忽略这些客观情况，思想上还是有警惕的。在调查过程中多次听取……，要他提供他认为“可靠”的线索，经50多个有关人员的了解，他们反映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至于是否像丁对我说的，舟山地委事先安排了布置，因此在我去调查时被他们“瞒住”了呢？经再三回忆和自问，感到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迹象。<sup>1</sup>

大约1963年4月份，丁志伟第二次前往北京。与第一次赴京无果而终相比，这一次他很可能收到了相关部门答复。丁志伟可能仍在被“抄家”和“提拔农工部副部长”的问题上纠缠，但毕竟他只是风闻，没有直接证据。北京的答复也是劝他不要再做坚持。<sup>2</sup>

## 六 生与名的考量

1963年4月27日，丁志伟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二弟写信，流露出经历坎坷后的绝望：

现在我处在这样的地步，随时随地有光荣牺牲的可能，我死了以后，你将我的材料交给党。我现在处境很困难，但亦想好了，自古人生谁不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会给我下结论的。……哥哥只能杀身成仁，不能屈膝投降，因为我坚信的事实是真理，又是舟山干部群众都知道的，现在他们屈服于地委书记的权势，不敢给我作证明，我若不坚持向他们投降，历史今后会嘲讽我的，那还是死了痛快。<sup>3</sup>

大约从这时开始，丁志伟的文字中开始频繁出现“死”的字眼，也开始考虑身后正名

<sup>1</sup> 《张雨调查材料》，1963年5月31日。

<sup>2</sup> 丁志伟：《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

<sup>3</sup> 丁志伟：《给胞弟丁世忠的信》1963年4月27日。

的问题。这不单是顿挫后失望、绝望的流露，也是丁志伟切身体会到的人身不安的流露。因为在此前后，他可能风闻了对他不利的一个消息：舟山地委决定逮捕丁志伟。

1963年5月10日，尚未被捕的丁志伟给舟山专员公署副专员吴志（子）诚写信：

吴志（子）诚专员：

这几年来我很想找领导上谈一谈，可是亦感到很难谈。回忆在62年2月底我放弃这两个问题，您问我心情能够舒畅否？我亦实事求是向您说了。可是问题是个别人得寸进尺，以至搞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这次我来北京是万不得已，逮捕前，一切准备工作我都做好了。现在我听后组织上发落，亦许我这样是神经过敏，但是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叫我这样想。丁志伟始终不能理解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能容我一个小小的丁志伟，这场斗争我作许多的让步，可是有人看到我是一个恐惧的人，应该给我想一想。政治舞台上我根本不懂得，我不会搞别人，我只懂实事求是。我是他们培养起来的，虽然我做了些冒昧的事情，引起某些领导的不满，可是我只一个人呀。一时冲动，做了一些尝试，亦应该给我谈一谈，给我讲讲利害关系，我怎么会不听呢？现在这些问题叫丁志伟有何面目承认呢？怎么叫丁志伟去见广大的同志呢？这些问题同志们都知道，丁志伟承认以后比鸡狗都不如了，因此我宁可杀身成仁，不愿屈膝投降。

最近几天我给崔、王提出我的要求，介决这场斗争的办法，1、只搞清搜查，只怪郑贤芳一人。2、提拔的问题我放弃了，现在同志们说与我开玩笑，我没有亲眼看到，没有理由再坚持，这个事全都由我负责。3、对领导上过去所提意见，我都收回来，今后言归于好，这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这样好不好，我没有发言权。问题在各位首长，这样组织上错只错在情况不了解，也可以说得过去。我这样对党的事业，对各位领导，对我自己，对全体同志都好，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假使说这样也不好，那么请他们给我一条路走走，我现在做人没有味道，逮捕、枪毙都好。我现在已回家，因为他们扣了我四个月工资，我无法工作。请领导上劝劝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合理介决这个问题。我毕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过去根本没有意见，我意见只对郑贤芳（白泉公社组织干部）、徐金海（白泉公社社长）。第二，这样做是个万全之策，领导上过去都很好，不管工作不管其他方面，我应该考虑党的事业，考虑别人的困难，根本没有需要彻底搞清不必要的问题。第三，我也可以向全舟山干部保证，向领导上保证，合理介决以后，我不会再搞了。再搞我会脱离群众，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唾骂。四、老实向领导上说，这次华东、中央都说这个职务问题我不该搞，中央也这么说，我有什么理由再搞呢？第五、领导上同意我的意见的话，能够给我报销一些路费，我就完全满意了。我要说的我心中的话，都向领导说了一说，假使说领导上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最多搞死我吧，死我也想好了，坐牢我也想好了。可我坐牢以后，死了以后更能激起正义人们的舆论，引起上级党的重视。丁志伟虽死犹荣，死得很有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也瞑目了。至于回家吗？我已经回来了。我不计较 50.5 块。最后要求领导上听听我的要求，这是真正的情谊。关于开除我党籍的问题，我也认了，只和我自己急于搞这些问题，威胁要发传单所造成的。

敬礼！

丁志伟/63.5.10

或许逮捕令让丁志伟感到了真正的恐惧，丁志伟在字里行间开始流露一种妥协语气，比如“亦许我这样是神经过敏”，“为什么不容我一个小小的丁志伟”，“我做了些冒昧的事”，“一时冲动”，“以后比鸡狗都不如了”等等。也可能群众舆论已经出现于己不利的倾向，群众开始时虽然知道丁志伟有冤屈，但这样大搞大闹的做法，时间久了难免引起反感。丁志伟自己也意识到，“再搞我会脱离群众，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唾骂”。

这些情况都促使丁志伟冷静下来，反思自己这几年的行为。丁志伟已经意识到自己不

懂政治，这意味着他也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三年前写《反浮夸风报告》时，丁志伟的纠结尚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而此时，他的顾虑已经转向生命与名誉的考量。“最多搞死我吧！死我亦想好了！坐牢我也想好了，可是我坐牢以后，死了以后，可能更激起正义人们的舆论，引起上级党的重视。丁志伟虽死犹荣，死得很有价值。”<sup>1</sup>

5月30日，丁志伟起草《历史的见证——天大的冤枉》，这几乎是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他控诉道：“历史早就证明我是对的，可是我现在反被舟山地委莱芜帮合伙陷害……最后置我于死地。”丁志伟如同落水的求生者，拼命挣扎，希望抓住无济于事的救命稻草。他在文件中号召党内同志提建议，期待党中央根据八届十中全会有计划交流党政干部的决定<sup>2</sup>，把舟山的莱芜帮调离出去。<sup>3</sup>丁志伟显然不想默默地死去，死也得为自己讨个说法。他不仅为亲朋好友而写，也为身为共产党员的地方干部而写。他将名誉至于当前斗争的胜利之上，希望后来者能为自己讨个公道说法。

1963年6月12日，舟山地委监委在报告中写道：“党对丁教育仁至义尽，不可救药，应当一刀两断”，“丁已堕落成坏分子，开除公职送劳教，并在干群中公开宣布处理”。<sup>4</sup>8月12日，省监委在报告中进一步确认：“丁志伟是一个坚持错误的无理取闹分子”，“一贯坚持其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不仅是无理取闹的问题，而且使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同意舟山地委的处理，开除其党籍，开除其公职，逮捕法办”。<sup>5</sup>

丁志伟的申诉历程不仅给自己惹了麻烦，而且祸及整个家庭。二弟丁士忠从北大毕业时，并没有顺利地分配工作，而是来到一个劳动农场先接受改造。丁士忠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学的是核物理系原子能专业。当时，学生专业的选择与家庭出身有很大关联，比如，一些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联系的专业，往往只允许家庭出身好的学生选择。丁士忠能学习

<sup>1</sup> 丁志伟：《给吴志（子）诚专员的信》，1963年5月1日。

<sup>2</sup> 《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1962年9月27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sup>3</sup> 丁志伟：《历史见证——天大的冤枉》，1963年5月30日。

<sup>4</sup> 《1963年6月12日舟山地委监委报告记录》

<sup>5</sup>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监察委员会报告》，1963年8月12日。

原子能专业，与他当时贫农的家庭成分不无关系。但毕业时，他的家庭成分已经改划为落魄资产阶级，这次划分显然影响了他的分配。丁士忠为此不断给组织写信申诉，他的行为和家庭遭遇被另一位参与劳动的北大学生知晓，他同情丁士忠的际遇，却也清楚类似问题太多，很难解决。<sup>1</sup>

三弟丁士杰 1960 年春考入杭州大学化学系，1961 年 9 月由浙江省科学院选送上海科技大学学习。1962 年 8 月，因浙江省科学院停办，丁士杰返回杭州大学转政治系学习。1962 年 9 月 3 日，丁士杰给哥哥丁志伟的劝慰信中，对中国政治氛围颇有犀利批判。1964 年 8 月，以“同情、支持其哥哥丁志伟反党、反革命活动，有赞同修正主义观点，对现实不满”为由，定位“反动学生”，开除党籍、学籍，送回原籍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对丁士杰的处分依据，是在他哥哥丁志伟被捕后，干部在他家中搜出丁士杰给丁志伟的部分信件。<sup>2</sup>

1966 年 12 月 30 号，丁士杰预感到文革中的舟山动荡，因此决定逃出舟山。他的出逃也有另外目的，即前往北京为自己的哥哥申诉。为了筹集北上路费，他不得不在出逃前零散卖掉家中的家具。在卖床的时候，他意外发现床头木板里藏着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正是



大哥丁志伟在被捕前写下的申诉材料，也是躲过地方干部抄家的幸存材料。除了《反浮夸风报告》外，其他材料均为丁士杰头一次所见。

左图 丁志伟当年阅读且保留至今的书籍

狱中的丁志伟在接受改造的同时，仍不忘坚持自学。1965 年 11 月底，丁志伟给三弟寄信，谈到让弟弟给自己买书的事情：

我看书的本领很大，几本书，没有几天都可以给我看完，我叫你源源不断给我寄点书，

<sup>1</sup> 唐云（1941 年—），2018 年 4 月 27 日，清华大学。

<sup>2</sup> 《杭州大学关于丁士杰同志开除党籍、学籍问题的复查决定》，1979 年 12 月 12 日。

及到我死了为止。家中的一切，你们兄弟二人处理就是。士忠可以结婚了，你过一、二年亦可以结婚了。关于我自己的家，我想得很明白，多考虑亦没有用。死了就死了算了，人做过了！我希望死神早日到来，可是死神就是不来！死神不来，叫我活着，我只好活着。活着就要看书，书现在比吃饭还重要。我可以十天二十天不吃，可是不能一天没有书看。

1

1967年3月，中央最高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部和中央监委联合审理丁志伟案件。1967年9月，丁志伟被带上“反革命”帽子，判刑20年，理由是“在狱中反毛主席和江青同志”。<sup>2</sup>他没有熬过20年的刑期，仅仅三年过后，便在浙江金华十里丰劳改农场去世。

3

## 七 尾声：一个历史叙述者的思考

1979年2月，舟山地区开始落实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这项工作持续到1983年。<sup>4</sup>1983年4月，浙江舟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上面写道：

在关押期间，丁多次违犯监规打骂看守人员，并声称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用牙膏壳在草纸上乱写攻击党与领袖的错误词句等事实。但从多方考察，尚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据此，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处罚不当。

决议最终结论是“撤销本院（64）舟法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宣告丁志伟无罪”。<sup>5</sup>6月4日，舟山地委纪委发出文件，同意恢复丁志伟党籍，将其家庭成分恢复到土改时划的贫农成分。<sup>6</sup>

二十年后，丁志伟的冤屈最终获得平反。但结论却让丁士杰感到可叹、可笑。文革结

<sup>1</sup> 《丁志伟致丁士杰信》，1965年11月底。

<sup>2</sup> 《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9月8日。

<sup>3</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91年6月。

<sup>4</sup> 《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页。

<sup>5</sup> 《浙江省舟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83年4月2日。

<sup>6</sup> 《中共舟山地委关于对丁志伟问题复议复查情况报告的批复》，1983年6月4日。

束后，阶级斗争和阶级成分的概念渐成历史。这种情境下，恢复原来贫农成分的决定让丁士杰啼笑皆非。况且，丁士杰认为判决书的很多文字闪烁其词，显然是为了摆脱舟山地委的责任。比如，对于哥哥的去世，判决书写的是1970年11月病亡于十里丰农场，但丁士杰认定他是被人打死的。另外，判决书在最终做出无罪宣告前，仍然列举了丁志伟窃取材料、诬告他人、攻击领袖等罪名，像是给先前的审判找台阶，丁士杰很气愤。丁士杰在1983年7月的申诉中写道：“舟山中级法院宣告丁志伟无罪的判决书，同六七年判决丁志伟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本质上完全相同”，“这不是落实党的政策，而是继续掩盖左的错误，这不是在纠正冤假错案，而是左的错误倾向在新形势下的挣扎”。<sup>1</sup>

丁士杰此后多次申诉，想为哥哥讨一个彻底公道的说法，并希望中央追认丁志伟为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他的努力一时不及预期，于是只能暂时留住材料，等待未来的机会。这些材料既有自己书写的申诉文件，也有文革中意外发现的哥哥保存的材料。

2018年3月，我从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唐云那里获知故事，并由其代为联络，获得了这批民间史料。唐云先生正是上文提及的北大毕业生，曾与丁志伟二弟在同一个农场参加劳动。理顺史料后，我隐约看到了特殊年代一位基层干部的内心曲折，为此，特地前往浙江舟山，同丁志伟的三弟丁士杰讨论这个故事。



丁志伟的个案具有一定史学价值，它呈现了当时基层干部的心态史料，因此有助于从基层干部的个体视角理解那个时代。长期以来，对“大跃进”及其后续影响的认知，学界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即便涉及微观，也多是群体的行为呈现，却鲜有系统的

（丁士杰向笔者提供的部分材料）体现个人命运、观念波动的故事。人们往往想到群体无理性、

<sup>1</sup> 《丁士杰申诉材料》，1983年7月11日。

乌合之众等概念，并借此想象那个特殊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看到发自肺腑的集体欢腾，也看到了顺应时势的政治演出，但似乎忽略了为数不多的呐喊者。相对而言，他们保持了理性与常识认知，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发出质疑。他们往往个性耿直，也往往因此命运坎坷。

在所有反应丁志伟故事的材料中，《反浮夸风报告》无疑具有最大史料价值。当然，历史叙述者在使用这份史料时，仍有必要看到可能潜在的问题。丁志伟写这份报告的意图，既是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冤屈，同时也分析浮夸的原因、表现，并发出纠正浮夸的呐喊。从这一点考虑，报告反映故事的来龙去脉，大体可以作为历史叙述的参照。但从个体感情层面分析，这份报告仍有微妙之处值得注意。丁志伟1960年6月写这份报告，分析的是1959年发生的事情，记忆本身已经给历史添加了时间维度。从1959年到写报告时，丁志伟受到的不顺与压制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这意味着他很可能在书写回忆性文字时，将后来不断累计的情绪挪到早期的故事叙述中。比如，丁志伟在报告中写下几段对话，这是不是历史情境中真实发生过的，或者他有没有无意中把自己此后的思考添加到过去的故事中，这些问题我们无法给出明确回答。

丁志伟在此后的申诉文件中，多次提到他的事迹已经轰动舟山。在对丁士杰的访谈中，他也认定哥哥的事迹在舟山家喻户晓。但我怀疑这种陈述有夸大的可能。2018年5月9日，丁士杰带我访问舟山一位老人，据说当年公社干部抄丁志伟家时，正是这位老人带领他们前往，她当时是居委会主任。老人愿意给抄家事情作证，并在丁士杰写好的书面材料上签了字。当我问起丁志伟反浮夸在当时是否轰动时，尽管她的口音让我难做辨别，但从略有沉默的反应看，这个事件的影响似乎不至于轰动舟山。我也尝试到舟山市档案馆寻找相关记载，但并没有收获。不排除确有关于丁志伟的记载，但没有被我发现的可能。但我隐隐感觉，或许这个事件在当年的舟山官场确有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给地方干部带来不少麻烦，至于它在民间是否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仍是难以确定的。

有太多的细节问题难以确定。丁志伟的申诉和监委的调查自始至终存在冲突，比如“抄



家”与“提拔副部长”的问题，真相也许是以下诸多情况中的一种：也许省监委调查案件时，舟山县委为了掩盖失误、责任，已经做好布置，统一口径，否认有抄家和提拔的事情。也许确有抄家与提拔的事情，舟山地委也没有应付检查，统一口径，但在民间取证时，老百姓因为对官员的畏惧，不敢为丁志伟做证明。也许确有抄家和提拔，也有目击百姓做了证明，但省监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玩忽职守，收受贿赂，歪曲调查事实。抑或刻意掩盖事实的不是别人，正是丁志伟自己。他为了渲染自己的冤屈，为了进一步宣传反浮夸风的想法，也为了制造更大的民众舆论，情急之下托人作假证，以便在这场民告官的官司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在这场斗争中，舟山地委和丁志伟可能都有造势的念头。舟山地委揪住“抄家”、“提拔副部长”的问题不放，大概有“攻其一点，不管其余”的想法。也就是说，假如这两件事情真是空穴来风，那么即便丁志伟在其它问题上有理，他的坚持也可被视作无理取闹，舟山地委足以做大文章，给丁志伟按个罪名。另一方面，在事情闹大到超出预期后，丁志伟骑虎难下，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并想要在大造舆论和不断上诉中，使自己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即便最后希望渺茫，他在生命与名誉的考量中，也坚定了战斗到底的决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得不到解释。1958年至1970年，丁志伟做过一系列反抗与挣扎。或许从最初那一刻起，丁志伟近乎偏执的性情已经决定了他抗争的徒劳。在他的个案中，就像政治运动年代的许多人一样，这种鲜明的个性往往使他们成为运动波及的对象。丁志伟生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也正源自他耿直的性情，他认理不认人，耿直的性情催生了他对带有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的笃信。至于他早年如何形成了这样的性情，我只能从并不丰富的线索中寻得一鳞半爪的解释：童年的凄惨境遇与共产党带来和平局面的对比，是他这种性情形成的重要因素。但一定还有其他的重要因素，比如父母的角色、少年教育经历等，这些是这篇文章无法呈现的。

当然，我们仍能大致确定很多历史事实：“大跃进”初期，丁志伟没有顺从大流，虚报产量；1960年，丁志伟反对浮夸，并表现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考力；同样1960年，

丁志伟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比1978年中国改革的先声早了十八年。我们也能确定，在整个过程中，丁志伟始终处在“孤立”、“少数”的状态中。从更大层面，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浮夸泛滥，看到南下干部与本土干部的矛盾问题……

可以想象，面对狱中冰冷的墙壁，丁志伟很可能重新想起《孙安动本》的戏剧。这出为民请命的柳子戏，促使他在浮夸世风中发出呐喊。而当年的他也许从未料想，这个剧本早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注脚。世事恍惚，他在历史与现实的穿梭中看到了绝望。

我们很难说丁志伟是寻常的基层干部，他在旁观，也在呐喊，既是囚徒，也是斗士。他与毛泽东时代的许多亲历者一样，钟情于共产主义的原则与想象。他一生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恰恰源自这种笃信与想象。不过，他更是一位挖掘者，试图探索深邃幽暗之境。尽管他不断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私人目的，但他或许也意识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记录自己的遭遇，发出自己的呐喊。我们无法确信他诉说的每件事都真实无误，但可以肯定，这些事情，他都想留给后世。

附

## 反浮夸风报告\*

### 一、讲真话，坚持真理，亦要靠党支持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无论伟大的领袖，还是挑大粪的，扫街道的，挖煤的，只要他手里有真理就要跟。”（呀！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条件是难以实现的，没有党的支持是不可能很快实现的。）

一九五九年党内通信中教导我们讲真话。（呀！讲真话亦要靠党的支持啦！从我们实践中深深体会到真理的成长是多么的不容易，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过程。有些人明明知道真理，而不坚持真理，叫人家亦不坚持真理，甚至用各种手段压服追求真理

---

\* 注：此篇为1960年1月手写稿内容，1967年丁士杰整理复印这一文件时，删去了括号里的部分。文中……×代表无法辨识的文字。

的同志。)为了坚持真理,为了讲真话,(为了立标兵),我与党委书记魏绥之、社长徐金海有过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为此,(他们认为我不听党的话,与党唱对台戏,不服从领导),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将我列为重点对象,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个人野心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受过二次重点批判,宣布犯错误,还给严重警告处分,为了证实他们的看法),还抄了我的家,(搜查了我的箱子,检查了我10年生活工作的记录簿,叫我去劳动锻炼,直到现在真像还未全部清楚!是不是我真有问题呢?不是的!我自己认为立场观点上没有问题,对三面红旗没有动摇,没有破坏团结,没有违法乱纪,没有失职,没有不完成党所交的任务!)是不是他们打击报复呢?不是的,而是他们认为我不听他们的话,想压服我!我没有服!我认为自己是坚持真理!

## 二、大跃进结下了丰硕果实

五九年二月,我调到舟山县白泉公社做组织工作,党内是党委组织委员。党委书记是动员我参加工作的老上级,(几年相处下来,)蒙他的赏识,几次向组织上要求调我到白泉工作,以后叫我包一个管理区。我自己落实在金星生产队搞重点。根据当时郑州会议的形势与任务,(以及五八年的经验教训,为了五九年更大跃进,巩固人民公社,)我与党支部商量提出小麦、早稻、番薯、畜牧业、全年收入五项指标向本社五八年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和平生产队开展竞赛,(提出了“学和平超和平”的口号,发出了决心书,目的是为了掀起一个学赶超帮运动,推动全社工作。)当时领导上说:“(超和平决心是好的,但)金星基础差,土质差,绿肥生长又不好,超和平不可能实现。”(我向党委表示态度,一定要超过和平。)我说:“事在人为,条件可以改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大作用,)同样的客观条件,超过和平不能说服人,客观条件差,超过和平,才能破除人们的迷信。”我们依靠党委领导与党支部全体社员共同努力,(结果大小麦去的全社第一,畜牧业赶上全社养猪冠军爱国队,亦夺得全社第一,早稻产量亦夺得全社第一,增产幅度比五八年将近增长50%。)整个公社各项生产都比五八年发展得更好、更快、更全面。可是为了讲真

话，坚持真理，立标兵，引起了一系列激烈斗争，一系列问题就这样产生了。

### 三、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坚持真理还是随大流？

对待产量问题，我坚决反对瞒产私分，亦反对虚报浮夸。我认为立标兵应该建筑在说真话的基础上。（处处为立标兵着想，维护标兵的言行才讲真话。）当早稻收割时候，县委公布了早稻八百斤队、千斤队的奖励办法。魏书记问我金星产量有多少，我说只有七百斤左右。魏书记说：“看领导意思，叫我们搞八百斤公社。”问我怎么样。我说：“实事求是好了，毛主席在党内通信中叫我们讲真话，我们要吸收五八年教训，谭震林同志的放开肚皮吃饱饭，是我们浮夸造成的，虚报成绩要犯错误。临安县委书记秦敬亭同志五二年因虚报成绩受到党内处分。”魏书记说：“五八年县委艾衍笃副书记在和平搞重点，搞出双千斤，实际产量艾不是不知道。”我反复劝魏书记实事求是好，不实事求是没有好处。接着，党委会上讨论了早稻产量，魏书记传达了县委在和平搞千斤队，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唐守能汇报了和平搞千斤队的过程和办法，亩产由六百斤到一千零二斤的问题，明显告诉大家叫我们说假话。徐社长问：“金星万强是什么队？”我当场向党委汇报金星只有七百斤左右。党委委员陈××等说：“有七百斤，保证可搞千斤队。”我说：“不敢报。”徐社长说：“不要唱低调，小小金星不是要超和平吗？”我说实事求是共产党人的固作风，超不超和平，看今后分配产量就行了。徐社长当场发火说：“党委个别成员思想意识不好，挖社会主义墙角。”结果党委决定金星、万强等四个队搞八百斤队，整个公社为六百五十斤。为了执行党委决议，我与金星党支部商量，毛谷打八七折，亩产上报八百零七斤。由于县委统一以八五折计算而没有受到奖励。这样，全社早稻产量最高的金星队没有评上八百斤队，而产量比金星低的队，却得到千斤队、八百斤队，得到县委在政治上、物质上的奖励。由于白泉公社早稻产量是六百五十斤，县委重点由白泉转移到虚报产量八百斤的岱中公社。从此领导上亦归罪于丁志伟，说我不听党的话，与党唱对台戏，不服从领导。我认为领导的话正确的就是党的话，不正确的不能代表党的话。难道浮夸、虚报是

党的话吗？实事求是、讲真话是与党唱对台戏吗？是不是我只反对浮夸不反对瞒产私分呢？不是的！我亦坚决反对瞒产私分。早稻收割后，我发现大支生产队有瞒产，魏书记问：“哪一个同志去大支反瞒产？”我当场向党委表示态度，说在七天内保证搞清楚大支产量，以后亦按期完成了任务。我被批判当重点对象，徐社长宣布我犯错误以后，将我放到三类型×强生产队去工作。我向瞒产私分做了坚决斗争，（反出了富裕农民为首隐瞒粮食的小集团，）反出了瞒产三千多斤粮食，（可是整个公社在五九年反瞒产私分上反出多少粮食呢？）

（说三个队报出来的粮食与地下仓库经过搬仓过称，确实有瞒产，金星报出来的七万斤粮食，搬仓过称只少了二百斤，而且还在大会上引导启发做典型发言。会后，为了做到省委规定的不准有两本账，由总会计徐××介绍了早稻一本账办法，将这笔报出来的空××——85%作为超产部分奖励给社员，15%交给大队为公共积累。这笔产量只在账上反映，不向社员传达。——凭空加上50%×一倍的空产量难道就会×他的主观意志而存在吗？他们违反了客观存在不随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个唯物主义原则。他们这样做给干部灌输了一次资产阶级虚伪浮夸教育，……阳奉阴违，二面手法，给干部思想造成……从此，虚伪浮夸之风到处形成，助长了干部只说不做、只求数字不求实际，不积极介决实际问题的不良倾向。浮夸给畜牧业带来很大损失。由于满足上级数字，对小猪不断外流、病疫不断发生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介决，全社向县上报有×个生产队已达到亩地一猪。根据本月×日材料，除金星……生产队外，很多生产队没有达到，有的只有四成、五成。连全县养猪标兵爱国队上报每亩2.33头，实际每亩只有0.78头，总数1227头。各种生产计划面积不能很好完成，统计有时候失去参考价值。他们与浮夸成缘，恋恋不舍。今年大小麦上报亩产×斤，实际上又凭空加上了60%的空数字。社长徐金海在党委会上说：“这次大小麦产量，党委会上决定以后不用再变动了。”他们越来越赏识浮夸，越来越离不开浮夸，对浮夸的同志，反而说他们听党的话。在组织路线上，不知不觉出现这个倾向。）

#### 四、听真话好，还是听假话好？

县委重点由白泉移到岱中，给白泉公社一个很大的压力。魏书记非常……，深入各队，日夜苦干，全党全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终于使晚稻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大丰收，产量比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左右。领导上为了吸取早稻教训，加上批判丁志伟之后，取得了上下思想统一，将全社晚稻产量上报为八百五十八斤，但年终分配始终核不实，都怕实事求是讲真话被当作否定大跃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直到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全社×中小队长干部开了七天七夜会议来核实晚稻产量，会上造成了一个气氛：一、讲真话就是否定大跃进，是右倾机会主义。二、晚稻产量不比早稻产量低。

#### 五、浮夸风是怎样产生的？

浮夸除了一部分因人事水平限制以外，归根结蒂是个人主义的产物，与我们共产党人实事求是风格水火不相容。（官僚主义在客观上助长了虚伪浮夸的形成，做了浮夸的防空洞，而）个人主义从主观上赏识了浮夸，（赞扬其有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给予合法地位，而且支持培植了浮夸作风的成长，他们往往）打着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的幌子，利用浮夸达到个人的目的。浮夸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明白立标兵与讲真话的关系，不明确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立标兵应该建筑在讲真话的基础上，处处为立标兵着想，维护标兵的言行才标讲真话。有的同志是曲介了先虚后实的含义，有的单纯认为立标兵可以推动全局工作。其浮夸是认识水平所限制。

第二种是锦标主义出发，单纯的为了争先进，争光荣，有的为了吹嘘自己，有的是对人家先进不相信，不服气，有的是为了骗取党对他的信任。

第三种是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完成当所交给的人物，为了怕整风，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择手段。

第四种是看大势，随大流，你报我也报，反正大家心里有数。有的在领导授意下要挟下或周围影响下出现的。

这四种情况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了浮夸风。

## 六、面对现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深深体会到浮夸是祸国殃民，是一个腐蚀剂。浮夸给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带来困难，给国民经济计划造成失调的危险，使上级对下情不能正确及时的掌握，不能很好地指导工作。同时，给党在政治上带来了眼中损失。有的说共产党拾到一本说乱话的书，不是亲眼看到的不要相信。浮夸严重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助长了干部光说不做的工作作风，形成了思想意识上的虚伪，逢人不说真心话，对党不讲忠诚话，会使学赶超帮运动不能踏踏实实进行，而真正瞒产私分却逍遥法外，浮夸给会计账目带来混乱，给贪污盗窃提供了缺口，亦影响了干部和群众关系。浮夸对党对人民都不负责任，有的说分配产量和验收产量应该有差别，验收产量总要浪费一部分，可是分配产量和验收产量相差一倍左右，那浪费总不会那么严重吧！既然浪费了那为什么要搞二本账，不允许不允许而出现一本特别账呢？这本账不是骗取党的信任，欺骗党的有力证明吗？有的人不承认自己有浮夸，说：“白泉去年早稻晚稻都是岱中高，而全县口粮标我们白泉最宽，我们白泉没有向县委要回一斤粮食，其他公社哪一个不向县委要粮食？”这句话道破了浮夸是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更应该下决心，乘这次新三反之东风，火烧这个怪东西，拿起实践论、矛盾论的犀利武器，介剖一下浮夸的真面目，彻底肃清它，让真理之光大大发扬。人人讲真话，让标兵树立在讲真话的基础上，不让浮夸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侵蚀我们的阵地，进一步促进革命向“更高的”速度发展。🔥

浙江舟山白泉公社党委组织委员

丁志伟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九日

【红色文化】

## 军队的造神运动

余汝信

1967年中，由军队引领的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一 “四个伟大”与对毛的个人崇拜

1967年5月1日，首都各大报在头版发表林彪为“五一”国际劳动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sup>1</sup>

“四个伟大”的提法，始于1966年8月。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sup>2</sup>

“四个伟大”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毛稍后对“四个伟大”的封号似乎并不领情。196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sup>3</sup>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sup>4</sup>

既然毛泽东已表示“不高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林彪为什么还要作这样的题词？事关林彪可能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不高兴”是真心的。因为林彪知道，历史上毛对个人崇拜是明确表明过赞成态度的。

<sup>1</sup> 《人民日报》，1967年5月1日。

<sup>2</sup> 《人民日报》，1966年9月1日。

<sup>3</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160。

<sup>4</sup>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年2月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1981年5月，页177。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对个人崇拜的认识问题说过一番话称，“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有的是过去压力残余，心理状态复杂）。还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sup>1</sup>

林蕴晖称，“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sup>2</sup>

文革第一年，毛泽东高调地八次检阅1,200万红卫兵，难道不也是八次高扬对他本人个人崇拜的过程吗？即使到了1970年12月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还说“总要有人崇拜嘛！”

<sup>1</sup> 林蕴晖：《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原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参见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173—174页。

<sup>2</sup> 林蕴晖：《中国六十年代造神运动的起源》，载《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原注：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第197、200页。

毛称，“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sup>1</sup>

毛其实是需要个人崇拜的，这一点林彪没有看错。惟林彪可能并不十分明白，毛需要的是高层次的崇拜，如需要有人将他的东西加以理论性的总结（如上升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毛反感的是低层次的崇拜，如一些反反复复、冠冕堂皇的套话及充满宗教色彩的顶礼膜拜。

## 二 “三忠于” “四无限”

1967年5月13日，《解放军报》发布“军委决定全军颁发特制毛主席像章”消息。该消息集“四个伟大”、“四无限”、“三忠于”之大成称，“我军全体同志，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他们早就迫切希望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佩戴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象征着我们时刻都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身边，象征着我们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同志，戴上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章，要更加忠于毛主席，更加忠于毛泽东思想，更加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勋。要更好地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我军真正办成

<sup>1</sup>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164、174。

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sup>1</sup>

此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提法，又有所发展。

1967年11月26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党委全体会议以斗私批修纲总结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经验”时称，“使空军各级领导班子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三忠于”变成了“五忠于”。<sup>2</sup>

该报道的空军经验还称，“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是无产阶级的最高权威，是当代的列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主席就是革命，就是大公，大好；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是大私，大坏。……我们一定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sup>3</sup>

翌年，“三忠于”的提法又有新发展。1968年3月5日，新华社在报道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时称：

这次大会，突出了无产阶级的“忠”字，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于中央文革。忠于毛主席的一条红线统帅大会全过程。代表们说，我们开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会，讲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道理，介绍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经验，学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榜样。通过大会，进一步提高了对忠于毛主席的认识，扎深了忠

<sup>1</sup> 《解放军报》，1967年5月13日。

<sup>2</sup>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7日。

<sup>3</sup>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7日。

于毛主席的根子。他们决心要把“忠于毛主席”五个红彤彤的大字红透每根神经，红遍万里长空；决心无限忠于毛主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立新功。

.....

千重蓝天写不尽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万里长空容纳不下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革命战士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觉悟，最高贵的品质，最大的革命大节。我们千学习，万学习，就是要学习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千奋斗，万奋斗，就是要为树立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而奋斗。<sup>1</sup>

在这里，“三忠于”变成了“六忠于”（当然，核心还是“忠于毛主席”）。其表述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无限忠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限忠于中央文革的钢铁长城。”<sup>2</sup>

### 三 军队的“三忠于”活动

军队中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热潮，以海、空两大军种最为典型。

1967年12月，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称：

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普遍掀起大学大背大讲大用大唱毛主席语录、诗词和两个座右铭的热潮。许多同志能背“老三篇”和上百条语录，

---

<sup>1</sup> 《人民日报》，1968年3月6日。

<sup>2</sup> 人民日报》，1968年3月6日。

有的能背全本语录，做到“语录记心间，随时用起来”。传语录，相互送语录，交接班时交语录已成为风气。现在不仅平日坚持天天读，海上执勤、节假日，甚至战时都坚持天天读。每讲一次课，每办一件事，每发一次言，每谈一次话，每写一封信，都运用毛泽东思想。党团生活、行政会议、任务动员、工作总结等，都成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潜艇远航，在水下也大开讲用会，打破了“水下禁区”。飞行部队运用毛泽东思想指挥训练作战，打破了“空中禁区”。毛主席提倡的“完全”、“彻底”、三个“毫无”、两个“极端”、三个光辉形象和做“五种人”的思想，普遍深入人心。大家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染红每一个细胞，指挥每一根神经，统帅每一个行动”。许多单位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革教育，改革训练，大破洋条条、土框框，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sup>1</sup>

空军第五军 1968 年在有关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中称：

我军“三忠于”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感情，达到了新高度、上升到了新境界。把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真挚最赤诚的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一切言论行动中。开始出现了人人胸怀一个“忠”。人人培养一个“忠”，事事体现一个“忠”，时时想到一个“忠”的动人局面。从机关到连队，从机场到营房，从干部到战士，从阵地到课堂，从炮位到机舱，大搞思想“忠”字化。学习“忠”字化。工作“忠”字化。战斗“忠”字化。生活“忠”字化。忠于毛主席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正在成为贯穿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一切方面的一条最鲜

<sup>1</sup> 海军政治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要材料》，1968年4月，页114-116。

明最突出的红线。广大指战员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致敬,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纵情高唱《东方红》,“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打开红色宝书向毛主席请示。部队讲的是“忠”字课,开的是“忠”字讲用会,做的是“忠”字操,训练中进行的是“忠”字飞行日,“忠”字工作日。广大干部、战士写“忠”字诗,画“忠”字画,编“忠”字节目,演“忠”字戏,讲“忠”字的故事,出“忠”字的墙报,放“忠”字幻灯,建立红太阳影集,布置献“忠”室。“一帮一”、“一对红”帮在“忠”字上。红在“忠”字上、谈心活动在“忠”字上。连队在床头立了“促忠袋”,“忠”字栏,“进宝箱”,相互促进一个“忠”。广大指战员怀着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废寝忘食,在紧张战斗工作间隙中,精心制做毛主席像,编毛主席像框,件件作品都凝结着一个“忠”字,他们说:“一针一线绣‘忠’心,一笔一划刻‘忠’心,一点一滴树‘忠’心。永远忠于毛主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在广大指战员的脑海中。

该经验还称:

各部队通过大宣传、大发动,开誓师大会,献“忠”表“忠”大会,大造声势,掀起了人人献策、个个动手的群众性献“忠”表“忠”的热潮,大大激发了一个“忠”字。嘉兴基地机务八中队。在代表上北京出席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前夕,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全中队刻制了一块凝结七十六颗红心的金匾。许多同志都是第一次绘画,第一次雕刻。在刻制过程中,他们怀着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克服了许多困难。从星星出到东方红,从太阳升到日西下,连干了五个昼夜,终于刻制成功。不少战士眼睛熬红

了，用湿毛巾擦一擦再刻。手上起了血泡，用布包扎赶来再刻。有的同志手上的血和布粘在一起，还是坚持刻。战士们说：“血往‘忠’字上流，就是最大的幸福，劲往‘忠’字上使，就有无穷的力量。”高炮三团出国参战部队在他们离开祖国的前夕，战士们集体描绘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绣出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八个大字和一颗“忠”心。他们含着激动的泪花说：“千山万水望北京，千针万线绣个‘忠’，千言万语表心意，千秋万代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三忠于”活动群众发动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连几岁的娃娃也投入了“忠”字的洪流，芜湖基地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建立了“早请示”“晚汇报”、每餐向毛主席祝愿的制度。有一次吃饭老师没有组织小朋友祝愿，小朋友就说：“没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就不吃饭。”<sup>1</sup>

#### 四 军队对“副统帅”林彪的吹捧

伴随着对毛泽东的吹捧的，是对“副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吹捧。值得注意的是，军队此一时期对林彪颂扬的肉麻程度，甚至超越了毛泽东，这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与不快。

对林彪的吹捧，目前所能见到的，以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 1967 年 11 月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所作题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统帅毛主席，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政治报告调门最高。李作鹏在报告中称：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以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远见和智慧，以无比的魄力和毅力，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毛泽东

---

<sup>1</sup> 《7350 部队开展“三忠于”活动的经验》。7350 部队为空军第五军的代号。

思想的伟大红旗，亲自发动和领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为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插遍全世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每当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天才的政治家，作为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宣传他的学说，捍卫他的权威，阐明和发挥他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帮助世界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伟大的天才领袖。

十九世纪的伟大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的天才得以发挥，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恩格斯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恩格斯为了替无产阶级保全自己的领袖，承担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他同马克思并肩战斗，坚决粉碎了阴谋家巴枯宁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

到了二十世纪，伟大的天才是列宁。.....同列宁一起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是斯大林。斯大林用很大的精力宣传列宁主义，捍卫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权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副主席，几十年如一日，一贯忠于毛主席，怀着对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和最高统帅地位、宣传和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林彪副主席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是当代的列宁。象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样亲自指挥过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谁也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多方面的斗争；谁也没有象毛主席那样解决了那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旗帜，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林彪副主席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所作出的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字字句句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愿望，字字句句说到了亿万人民的心坎里，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感情，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自觉性。

.....

林彪副主席最忠实、最全面、最彻底地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最好，领会得最深最深，用得最活最活。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我们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林彪副主席总是告诉我们：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毛主席的一切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他把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指示，都当作最高的行动准则。他在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在

一系列的著作、讲话和指示中，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深刻地、创造性地阐明和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在他的四十多年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处处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林彪副主席最英明、最积极、最认真地领导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运动，开创了工农兵直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他发出了“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随着学习运动的发展，他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树立新的先进典型。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他把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从全军推向全国，现在正由全国逐步推向全世界。这种大好局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空前未有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他的这个伟大贡献，将作为划时代的伟大创举，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史册。<sup>1</sup>

以上所引李作鹏报告中最后一段话中的“这是林彪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他的这个伟大贡献，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值得我们子孙万代大颂特颂、大书特书。”笔者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识过。李作

---

<sup>1</sup> 海军政治部：《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主要材料》，1968年4月，页82-88。

鹏这些话使人产生一个疑问：林彪已经是“最卓越、最杰出、最伟大的贡献”，又“深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热烈最衷心的感谢”，那么，毛泽东又该往那儿摆呢？

## 五 中央警卫团首倡的“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中央警卫团（代号8341部队）向毛泽东报告称，“主席指示我们组织支工部队，到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考验，进行锻炼。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主席的无限热爱，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诚的感情，抱着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而伟大的支工任务的决心，于六月二十六日分别进入北京市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同时还派了一部分同志到北京市化工三厂。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现将针织总厂这一段工作的情况，向主席汇报。”

报告在谈到“大张旗鼓地推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时称：

大造学习声势，建立学习组织，健全学习制度，，布置学习环境。运用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集体学习语录），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等形式，向革命职工和家属，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在较短的时间内，掀起了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高潮。工人们说：

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心明眼亮有方向；

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检查工作和思想。

生产中看看车头镜（语录牌），干劲猛增大；

交班交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sup>1</sup>

---

<sup>1</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北京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1967年11月13日，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50号。

笔者认为，报告中所谓“上班向主席请示、下班向主席汇报”，就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源头。

11月15日，毛泽东在看了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和北京针织总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喜信后，批示称：“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11月1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350号中共中央文件告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称，“北京针织总厂革命委员会向主席报喜的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问题的报告，都很好，是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的一个典范。现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普遍阅读。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虽然中央警卫团的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早请示，晚汇报”的具体做法，惟既然毛泽东已称赞“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央又要求各地“请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早请示、晚汇报”还是迅速地推广至全国各地，并发展成一整套程式化的、内容大同小异却又繁简不一的仪式。笔者搜集到的一套仪式如下：

### （一）早请示

一、向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敬礼！

二、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新的一天工作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

众：我们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对您老人家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我们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要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

四、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让我们共同高唱《东方红》。

五、学习最高指示：（选读语录）

## （二）晚：汇报

一、向毛主席敬礼！

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均同早上）

三、学习最高指示：（选读语录）

四、汇报开始：（众）要斗私，批修。（三遍）

（由组织实施的负责同志针对一天来的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讲评，表扬好人好事，然后大家发言（简单扼要的）作为集体向毛主席汇报）

五、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让我们共同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sup>1</sup>

在浓重的个人崇拜氛围之下，“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毛泽东一句“很好，谢谢同志们！”进而发展成为这样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他本人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

---

<sup>1</sup>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0期）印。

## 六 毛泽东提出制止建塑像而军队未执行

1967年5月4日，一座高8.1米的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在清华大学校园内落成。新华社翌日以“阳光普照清华园”为题向全国报道了此一消息，并称，“塑像下面刊刻着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文革中落成的全国首座巨型毛泽东全身塑像。<sup>1</sup>

6月28日，林彪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7月1日，总参、总政在拟定的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中称，“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sup>2</sup>

7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批示称：

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sup>3</sup>

令人甚觉蹊跷的是，既然已有毛泽东7月5日的明确批示，到了7月10日，林彪为什么仍将上述总参、总政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可能林彪仍然认为，毛既然从不反对个人崇拜，类似这样的批示，不过是毛有意做出的高姿态？

<sup>1</sup> 《解放军报》，1967年5月6日。

<sup>2</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376。

<sup>3</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68。

7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总政通知稿批示称：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sup>1</sup>

毛泽东所称的“中央已有指示”，是指7月13日毛批示“照办”的、周恩来根据毛7月5日批示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塑像问题的指示稿，该指示稿全文如下：

### 关于建造毛主席塑象问题的指示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群众组织：

现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转发你们，希望你们认真执行。应当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解释：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建造毛主席塑象，确实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但是，建造毛主席的塑象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象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传之千秋万代。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才可能做好。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毛主席七月五日指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此外，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

<sup>1</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76。

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sup>1</sup>

196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中发[67]298号中共中央文件），该通知虽声称“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惟其实对执行“七·一三”指示的力度有所松动。该通知称：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军区、军分区党委、各级人民武装部，各群众组织：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下达后，许多地区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急切动工兴建。如此匆忙兴建，无统一规划，势必造成不良后果。为此，除重申：无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精神外，特通知如下：

一、凡经中央已批准夺权的省市，建造毛主席塑像，由省市统一规划，报请中央批准后再行兴建。

二、凡未经中央批准夺权的省市，毛主席塑像暂不兴建，待省市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后，再行办理。

三、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

---

<sup>1</sup> 中发[67]219号中共中央文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公室1967年7月15日翻印。



四、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sup>1</sup>

尤其是该通知称，“人民解放军机关兴建主席塑像，统报军委批准后执行”，实际上为军队机关建造毛塑像开了一个口子。

根据有关资料<sup>2</sup>的不完全统计，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①1967年6月11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②1967年8月18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③1967年9月25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④1967年10月1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大院、铁道兵机关大院、防化学兵机关大院；⑤1967年12月，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机关大楼前；⑥1968年7月1日，总后勤部机关大院、海军机关大院、炮兵机关大院。各大单位中，笔者惟未见空军、高等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资料。

毛泽东塑像落成有文字记载及照片留存的，仅见海军资料：“1967年7月10日，海军党委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军直属机关大院建立毛泽东主席全身巨型塑像。1968年7月1日，举行了塑像落成典礼。”<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除解放军政治学院外，其他单位的塑像全部是在“七一三”指示发布之后落成的，可见军队各大单位根本未将该指示放在眼里。

## 七 真正起到冷却作用的中发[69]33号文件

就制止在全国蔓延的建造巨型毛泽东塑像热潮而言，1967年7月13日的中发[67]219号文件及同年9月13日的中发[67]298号文件效果均不显著。而真正对狂热的“忠字化”

<sup>1</sup> 福州军区政治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1968年2月，页236-237。

<sup>2</sup> 主要根据各有关单位为毛泽东塑像落成而制造的纪念像章。

<sup>3</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海军·综述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2月版，页372。

造神运动的方方面面起到冷却作用的，是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中共中央于6月12日发出的[69]33号文件——《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该文件全文如下：

毛主席批示：照办。

### 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党政各部、委军管会或军代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城乡广大革命人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大大地加深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引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增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推动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关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但是，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有的借口宣传毛泽东思想，挥霍国家资财，不经批准，用烧瓷、石膏、塑料、金属等材料，塑造各种毛主席像；有的绘、印、绣毛主席像不认真，不郑重，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有的制作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样式繁多，质量又差；有的随意随处张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有的甚至设置“宝书台”、“忠字室”、“敬仰馆”、展览馆，等，跳“忠字舞”，到处贴“忠”字，大搞“忠字化”运动。这类形式主义的做法，虽则人们出自好意，却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有损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在政治上很不严肃。

宣传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符合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必须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广大革命群众把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落实到认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方面。把毛泽东思想用到实践中来，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二、重申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印制毛主席像和有毛主席形象的宣传画，必须经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认真讨论和批准。凡是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像一律不得悬挂。悬挂的地方要庄重、整洁、适当。

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要尊重、热爱毛主席像章，禁止用毛主席像章在街头进行交换。

凡存有过多的毛主席像章的机关、部队和个人，根据自愿原则，可以献出过多的那部分像章给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军区、各野战军，由他们分送给边远地区和农村的革命群众。

四、因为旧报纸需要使用和回炉，中央、地方和军内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

五、车辆、机器、武器装备、信封、信纸、办公用纸、生活用品、文具、儿童玩具以及各种商品、商标、包装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印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

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

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今后，单独的“忠”字，不要乱贴滥用，不要围绕“忠”字随意提一些不妥当的口号(例如：脚往“忠”字上走、血往“忠”字上流、劲往“忠”字上使)，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那些什么封建式(如小庙、牌坊、门楼、宝塔等)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

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

中发[69]33号文件最后注明：“此件发至省、军级，由省、军级各单位负责传达和处理”，规格颇高。惟中办在发出此文件时并没有标注密级，这似乎说明中央在提出这一详

细的对毛形象宣传改进意见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偷偷摸摸地保密进行。

中发[69]33号文件的作用应是明显的。原因不在文件本身，而是经历了两年多的狂热，造神运动的颠峰高潮已经过去。再疯狂的活动，也有疲惫之时，是该停歇停歇的时候了。

根据有关资料<sup>1</sup>的不完全统计，1967年6月至1968年7月一年间，北京地区各军兵种、大军区级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单位



(1968年7月1日在海军大院毛泽东塑像落成典礼上合影。前左起：吴瑞林、王宏坤、刘贤权、李作鹏、黄永胜、萧劲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机关大院落成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时间、地点如下：①1967年6月11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②1967年8月18日，通信兵机关大院；③1967年9月25日，装甲兵机关大院；④1967年10月1日，第二炮兵机关大院、工程兵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除解放军政治学院外，其他单位的塑像全部是在“七一三”指示发布之后落成的，可见军队各大单位根本未将该指示放在眼里。🔴

<sup>1</sup> 主要根据各有关单位为毛泽东塑像落成而制造的纪念像章。

【红色文化】

## 火药味

### ——战争语言漫笔（一）

启之

—

七十年代，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决裂》。影片的开头，农场场长龙国政去见当年的老团长，时任地委副书记的唐宁。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唐问龙：又上前线了？

龙站正敬礼：报告团长，刚下火线。

唐：你呀，还是那股劲头，想不想打仗？

龙：打仗？

唐：攻堡垒呀。

唐所说的打仗，是在山沟里建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要攻的堡垒，就是这所大学的领导权。而龙国正，一个部队转业红色大老粗，所渴望的火线战斗，就是把“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消灭干净。

“前线”、“火线”、“打仗”、“攻堡垒”这些毛泽东时代的常用语，从建国伊始，它们就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跑到日常语言之中吃香的喝辣的。语言学称这种现象为“泛化”。既然红色江山是枪杆子打出来的，那么，坐了江山以后，保留语言的火药味也不为过。何况，大批军人转到地方，某些战争用语随之进入社会生活也属正常。问题是，这些本应随着和平岁月的延伸而集体撤退的语言，不但没有在几年后退居二线，反而大举入侵日常生活，占据了从媒体到课堂，从书面到口头的所有阵地，作威作福，兴风做浪。

## 二

1994年,刁晏斌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找出712个军事词语,发现其中有258个泛化,占总数的36.2%强。这些泛化的词语以动词为多,如进攻、战斗等。名词也占一定的数量,如标兵、会战等。那些不能扩大使用范围的词语,主要是军衔、装备一类的,如少尉、大校、巡洋舰、无后座力炮等。刁认为,军事词语的泛化是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其它类词语虽也有泛化,但无论数量还是频率都无法与军事词语相比。为了说明这一点,刁又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找出372个工业词语,发现扩展到工业以外的只有17个,占总数的4.6%,其它可以泛化的农业、医药词语也与工业差不多。<sup>1</sup>

2008年,邱明波在学位论文中也做了多种统计。他以《军事大辞海》等军事辞典为依据,从《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的挑出“包围圈”、“边防军”、“标兵”、“兵团”等军事词语196个。从中发现“桥头堡”、“引爆”、“大战”等81个泛化词语。其泛化比率为41.3%。

他又考察分析了这81个泛化词语在台湾的《国语词典》和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发现其中有30个词语,在《国语词典》找不到踪影,而《现代汉语辞典》却宽容大度,仅仅拒收了17个。剩下的51个词语,在《国语词典》中有29个没有泛化,有22个泛化了。而在《现代汉语辞典》中未泛化的是24个,泛化的是40个。由此,邱得出结论:台湾《国语辞典》的泛化率是27.1%,而大陆的《现代汉语词典》的泛化率是49.3%。也就是说,大陆军事词语的泛化,比台湾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

邱先生还以《人民日报》1966--1976年和1984--2002年这两个时间段的社论,各130万字为语料,对上述81个泛化的军事词语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对比统计。又随机选了红卫兵、敌人、小将、胜利、前进、斗争、战线等20个常用的军事词语,在该语料中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革时期军事词语的使用量大、高频、面广。<sup>2</sup>

<sup>1</sup> 刁晏斌:《试论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哈尔滨,北方论丛,1994,12期。

<sup>2</sup> 邱明波:《亚文化视野下的军事词语泛化研究》,2008年,广西大学,汉语言文字硕士学位论文。  
<http://www.docin.com/p-420431451.html>

刁先生是第一个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泛化的人，其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具体的统计结果，而且在于他给学界提供了一个方法。他的统计结果被人们一再引用的同时，他的方法也不胫而走，成为众多研究者的说话的出发点。

邱明波的研究很有价值。他扩展并光大了刁先生的统计方法，不过也有一些小毛病。毛病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军事词语，如“红卫兵”、“旗帜”、“红旗”、“胜利”、“前进”一类，不能算是军事词语，尽管红卫兵从诞生之日起，就想把自己说成是一种特殊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色战士，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正经八百的军事辞典或军事语言著作肯收留他们。另外，也不宜把“旗帜”、“前进”、“胜利”等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的词语，扣押到军事一家之中。通过“窄化”某些词语，来夸大军事语言泛化的战果，此种做法属于什么性质，相信邱的导师们心里无数，否则这篇论文就不会带着这样的瑕疵问世。

### 三

为什么军事语言会泛化，专家们给出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条，一、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使军事语言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二，社会历史原因，大批军人转到地方；三、政治运动频繁，尤其是阶级斗争天天讲，造成了军事语言的大量使用；四、人民对解放军的崇敬，五、语言自身的需要。<sup>1</sup>

这些说法都不错，但是还有待细化深入。下面这两点是不应该忽略的——

第一，个人因素。毛泽东“好斗”的思想性格，更适于用那些带火药味的语言来表达，加之他对战争经验的迷恋，使其四九年以后的著作和讲话中仍带有大量的战争词语。1951年《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说，武训否定阶级斗争，“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有些共产党员“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1954年，赞赏李希凡批俞平伯的文章，是对资产阶

---

<sup>1</sup> 见刁晏斌、向音 李进学：《军事语言的泛化现象分析》现代语言，2008年第11期，邱明波同上、周毅：《文革称谓词的军事泛化及原因》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03，3期等。

级学术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957年,《事情在起变化》称反右派运动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称“右派猖狂进攻”是“自取灭亡。”60年代初,提出“要准备打仗”。1962年“不爱红装爱武装”。1964年,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1966年,发布五七指示”要求工农学、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去学军。到了文革,从穿上军装接见红卫兵,到“祝全国全面内战”。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和行为,借着个人崇拜的热浪,“一句顶一万句”的高温,极大地推动了这种泛化。

第二,国家军营化。三线建设,备战备荒,文革中的军训、拉练、军管、军宣队,五七干校的军队编制、军人进入权力机构,管理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国家机关,大批知青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等等,使军事词语更加深入社会生活。全国成了一个大兵营。

如果承认上述两条原因的话,研究者就应该把统计学做得更细,更深入——统计一下毛泽东在建政后对这些词语的使用,以及“三支两军”时期这类语言的使用频率。

#### 四

尽管研究者都提到,文革时期这一泛化达到了鼎盛,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种泛化的方向性和倾向性——它在战争语言的泛化之路上迅跑,且对火药味一见倾心,而这个火药味则暗藏着暴力的因子。也就是说,这一泛化的文化内涵在施放“正能量”的学人那里,被长久地漠视。

只有不受国内语境影响的中外学者才有可能参破这一层——专门研究文革语言的裴宜理、李逊早在1993年就指出:“军事语言的膨胀,与文化革命崇拜暴力有关”<sup>1</sup>她们所举的军事语言例子,如“万炮齐轰”、“猛烈开火”、“打响战斗”、“提供饱弹”、“吹响进军号”、“放好哨,站好岗”等等都是战争用语,而且大多数都有着浓浓的火药味。

军事是军队与战争之事,战争所指的武装斗争,只是军事的一部分。在战争之外,还

<sup>1</sup> 裴宜理 李逊:《革命的粗野》,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1993 Published in 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paper #2, July 1993; 广州社会科学院 1994 年《开放时代》杂志社,《现代与传统》。



有装备、编制、训练、后勤等等一大堆东西。上面所说的军事语言的泛化，主要表现在具有火药味的战争语言上面。正是由于这种语言在文艺中泛滥成灾，田汉才起来“反火药味”——戏里打炮是“话剧走的魔道”，舞台上枪杆子太多了，就没有艺术性了。也正是战争作品的没完没了，夏衍才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离革命经，叛战争道”的“离经叛道论”。

文革前夕，这两论被纳入江青所说的“黑八论”之中而大批特批，带火药味的语言、作品受到了鼓励，更加不可一世，“开火”“炮轰”“冲锋陷阵”“誓死捍卫”成了日常用语，比“你好”、“谢谢”、“对不起”还要高频。而另一方面，“反火药味”的田汉则被长久关押审查，其临死前，想见一见老母而不可得。提倡“离经叛道”的夏衍则在秦城的单间牢房里渡过了悠悠八载，腿被打断而不得医治，从此成了跛子。

显而易见，后勤、部署、标兵、站队、岗位，这些没有什么火药味的军事语言即使泛化，对社会生活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真正可怕的是富有火药味的战争语言的泛化。因此，笼统地把泛化说成是军事词语显得大而无当。准确的说法应该就是战争语言。战争是一种集体和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把战争语言从军事语言之中凸显出来，有利于认识这种泛化的暴力倾向。

## 五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告诉我们，战争语言在常态下的使用情况。

这部厚达一千五百页的词典，是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的专业人士与该校师生，历时五年零八个月（1979 年 11 月至 1985 年 7 月）共同战斗的结果。该词典统计了来自 179 种语料的 180 万字，这些文字取自四类语言作品：一、报刊政论文章及专著（440799 字，占全部语料总量的 24.39%），二、科普书刊（284308 字，占全部语料总量的 15.73%），三、剧本和日常口语材料（201892 字，占全部语料总量的 11.17%），四、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880399 字，占全部语料总量的 48.71%）。除了这四类语言作品之外，还包括

1978--1980 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语文课本。

上述 179 种语料，除了三部小说（《桐柏英雄》、《艳阳天》、《钢铁巨人》）之外，其它的语料都是文革之前（4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或之后（77 年至 80 年代初）的出版物。也就是说，这部词典有意地避开了文革十年。这一割断历史之举不能说没有道理，文革语言将汉语的政治化、战争化和粗口化推向了极致，尽管这“三化”源远流长，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但是，文革为它们提供了平台和跳板，使之完成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丑恶飞跃。可以说，文革语言就像文革政治一样，是非常态的。作为一本展示现代汉语使用频率的词典，回避非常态的语料，有利于得出符合常态的统计结果。

这个词典有大大小小 16 个词表，我从《频率最高的前 8000 个词词表》中，挑出了 20 个带有火药味的词，按照原表的“频率递降”顺序排列的，制成下表：

序号	词条	频率级次	词次	累次词次
153	敌人	148 1078	619186	
209	斗争	197 860	673915	
350	战争	313 506 766968		
576	战士	437 327 857924		
602	战斗	451 311 866215		
1343	消灭	627 131 1014613		
1097	武装	590 168 978361		
1165	进攻	602 156 989301		
1362	武器	629 129 1017088		
1425	打击	636 122 1024979		
1717	作战	661 97 1056682		
1860	歼灭	672 86 1069624		

2127	打仗	685 73	1090540
2212	攻击	689 69	1096556
2438	占领	696 62	1111239
3084	决战	713 45	1145079
3127	前线	715 43	1148918
3426	进军	720 38	1159154
3681	冲锋	723 35	1168440
3876	袭击	726 32	1174931

按照原表的说明，这 20 个词的使用频率分三个层次，“敌人”属第一层次（出现 1000 次以上，这类词共 175 个）与其频率级次相近的是连词“但是”，与其使用度相近的是“东西”。这类词都属于必用词。斗争、战争、战士、战斗、消灭、武装、进攻、武器、打击属于第二层次（出现在 100 次以上，这类词共 1678 个，它们对语料的复盖率为 80%），这些词“是当之无愧的最常使用的词”。（编纂说明，页 6）。作战、歼灭、打仗、攻击、占领、决战、前线、进军、冲锋、袭击属于第三层次（出现在 22 次以上，这类词共 5000 个，它们对语料的复盖面达到 91%），“可以说是比较常用词”（编纂说明，页 6）。

“敌人”就像“但是”、“东西”一样挂在嘴边，张嘴敌人，闭嘴敌人，这说明了什么？建设中的人们，念念不忘“斗争”、“战争”、“战斗”；人人都想当“战士”，用“武器”“武装”起来，“打击”之不足，还要“进攻”，直至“消灭”，又说明什么？和平时期的人们，时常“作战”、“打仗”、“进军”、“决战”、“冲锋”，念念不忘“攻击”、“歼灭”、“占领”、“前线”、“袭击”，又意味着什么？

报刊政论对这 20 个词更有亲和力，因此，在《报刊政论语体中前 4000 个高频词词表》之中，这些词的名次排得更为靠前。而且这类语体还义不容辞地散发出更浓火药味：手榴弹、炮弹、反攻、全歼、武力、宣战，围歼、进犯、扫荡等等，不胜枚举。

《文学作品中前 4000 个高频词词表》比报刊政论词表差一些，但是，敌人、战士、战斗、战争、打仗、火力、炮弹、战场、消灭等词，也荣列此表的前 2000 字之中。“敌人”还是排在第一，高踞第 115 位，“战斗”屈居第三，排在第 310 位，“斗争”排在第 506 位……

在《前 300 高频词分布情况分析》一表中，上述 20 个词中有两位当选：“敌人”排在 168 名，“斗争”排在第 272 名。而“革命”（第 112 名）则排在“敌人”之前 56 位，无独有偶，“阶级”（第 216）也高于“斗争”56 名。这一排序似乎也体现了现实的逻辑，革命先于敌人，阶级之后就是斗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百个词中，“妈妈”叨陪末座，排在了第 295 名，还差五名就出了局。

## 六


不少有识之士，贺卫方、余杰、顾土等，对战争语言的泛滥都表示忧心忡忡，《人民日报》的评论员顾土说得最中肯——

时至今日，战争思维、战争模式依然广泛普及。我们无论做什么还是喜欢设个指挥部，有总指挥、副总指挥，干什么都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学校、机关、团体依然习惯将总务叫后勤。盖个楼房，建个工程，公车站维持个秩序，也是红旗招展，口号满目，突击队冲锋在前。军事用语、战斗用语也已经泛滥到社会各个角落，什么工作都成了战役，什么方面都是战线，难一点的叫硬仗，需要费点力气的则叫攻坚战，来人多部门杂的就叫会战。凡事先也都要开个誓师大会、动员大会，事后当然都少不了总结表彰。用打仗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大的特征就是短期行为、短期效应，只顾眼前利益，不从长远考虑，图一时辉煌，不讲常态保持。<sup>1</sup>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有什么语言就有什么思维。如果说“万炮齐轰”、“猛烈开火”带来的是暴力。那么，“硬仗”、“会战”、“攻坚战”带来的则是

<sup>1</sup> 顾土：《质疑“战争危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二》，《记忆》2009 年第 23 期。

短期行为。

《军事语言学概论》的作者马教授认为，军事语言对全民语有突破有贡献。“由于军事语言的特殊地位和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性及自身发展的活跃性，它可丰富全民语的宝库。特殊情况下，甚至可带动并影响全民语的发展。如在战争年代、解放初和文革中，解放军的口头用词用语，成了全国人的口头禅。”<sup>1</sup>《军事语言的泛化现象分析》的两位作者与马教授持相类的观点：“军事语言的泛化，可以补充、丰富全民共同语。”“从语言运用和语言发展上看，又是积极的，有益的。”<sup>2</sup>

马教授和他的同事似乎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解放军的口头用词用语，成了全国人的口头禅”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心理是什么状态？

【何與懷評論】

## 且看两个“五四”人物的人生

何與懷

1946 年 9 月 14 日，因叛国罪，五十岁的梅思平被国民政府枪决于南京。过了二十年，1966 年 8 月 4 日，曹汝霖病逝于美国底特律，终年八十九岁。梅思平与曹汝霖均为 1919 年“五四事件”中一正一反的两个人物，看看这两个人物的人生，很有意思。

5 月 4 日那天，学生打着爱国的旗号，罢课游行，声势浩大。刚开始，游行还比较理性和温和。后来，在一些学生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火爆，开始打砸外货，扰乱秩序，殴打“卖国贼”。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北洋政府交通部长曹汝霖。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私人住处抓人，但这个卖国贼还是跑掉了。于是，激烈的学生领袖带头点火烧毁赵家楼。

<sup>1</sup> 马鸣春：关于研究、撰写《军事语言学概论》的几点说明（1），马鸣春博客，<http://blog.sina.com.cn/mamingchun>

<sup>2</sup> 向音 李进学：《军事语言的泛化现象分析》现代语文，2008，第 11 期。

火烧赵家楼后，面对众人非议，曹汝霖退出了政界，完全打消了东山再起的心思。他对自己十几年外交生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决心笃行慎为，浴火重生。曹汝霖虽然赋闲在家，并没有享清福。他经营银行，利用赚的钱，积极做慈善。他后来还花了大量钱财和精力，办了一所医院，穷人就医，缴费颇多优惠，甚至完全免费。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希望他能出山当华北伪政权的“元首”，曹汝霖以母命和多病表示“不能干”，抵制了拉拢，没有替日本人做事，反而为解救民国政府地下人员做了不少贡献。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此。刚好，当年参与火烧赵家楼的爱国青年梅思平就是其中一个。那把火，让他这个北京大学生威风凛凛，声名远播，一时风光无限，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典范。他毕业后没几年成了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然而，抗战期间，他却秘密潜入日占区，投靠日本人，随后一路高升，最后做到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央组织部长。

梅思平一生几十年从来没有过任何反思和忏悔。抗战胜利以后，以叛国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他，想到的依然是为自己辩护。他在《狱中自白》中，坚决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情理的正义之举，高尚之行。1946年9月14日凌晨，当梅思平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接到死刑执行令。七点不到，梅思平从监狱提出，带到临时刑场，一声枪响，应声而倒，成为第一个在南京被处决的大汉奸。“火烧赵家楼”的热血青年，就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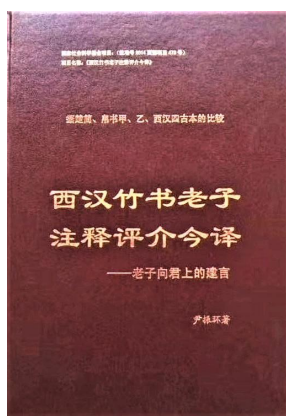
相反，“卖国贼”曹汝霖却在晚年进行了全面的自我反思。事实上，作为对日谈判一个代表，曹汝霖对“二十一条”是有所抵抗的，已尽了最大的力气，被骂卖国贼是有所冤枉。但他一生对此相当坦然处之。他在《一生之回忆》中谈到火烧赵家楼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他去世前，还作有一首小诗，曰：“八十九年一瞬间，一生事事总堪惭。惟存笔墨情犹在，留于人间做笑谈。”

许多人一定想不到，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竟然能够在国难面前坚贞不屈，守住民族气节；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真是正如几百年前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叹道：“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们说得好，历史真相虽然残酷，但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到头来，时间老人会作出无情的判决。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故事开端很美好伟大，但结尾很丑恶肮脏，内中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五四”至今，业已百年，想到这两个“五四”人物的人生，心中顿生感慨。🔥

### 【何與懷評論】

## 从老子被穿越“煽颠”谈起

何與懷



不是老说什么“穿越”吗？这是当今某种小说的时髦写作技巧。但千万别咬定这不过是小说家天马行空的想像。在一个神奇的国度，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某些“穿越”事故的。

这一次，就发生在远古哲人老子的身上。他肯定觉得他老子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穿越两千几百年施行“煽颠”奇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他能抵赖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是记录在一部书名为“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的大著上的。

（《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封面）这部书的副标题为“老子向君上的建言”。这个副标题就把老子出卖了。你何人？就斗敢向君上建言？而且建的是什么混账东西啊？且看此书堂而皇之几十章，每章的标题就这样阴阳怪气，居心叵测。例如什么“要使人民愚昧”；什么“天下都说我伟大，不像吧？”；什么“国君要知道自己的无知”；什么“必须借助神秘的天”；什么“从始至终，绝不好大喜功”；什么“治大国忌折腾”；什么“轻诺必寡信”；什么“百姓之不治，责任在君”；什么“功成身退”；什么“最好是降低智

者的声望”；什么“事事亲躬的君王必败”……等等。这不都是司马昭之心吗？

老子会争辩冤枉啊。但判决已作出了。有一个中共管思想领域的权威机构，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2019年3月6日，下达了一个通报——《关于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 中严把政治方向关的通知》。此文件称：“《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成果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已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撤项。”该文件要求相关管理单位“增强四个意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作为首要原则”，“确保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更好地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云云。

《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的作者名叫尹振环，已经高龄八十五岁，为老子研究专家，还是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退休教授。此次对他的“撤项”处理，其实并不新奇。就在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清华大学停止教职，因为他曾发文呼吁警惕“极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并平反“六四”；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因被学生举报在课堂上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被撤销教师资格……尹振环这件事不过是中共近年来不断趋于严厉禁言一个例子。而且，尹振环老先生活得久，免不了有“前科”。据查，他是个标准的“右派”。早在1959年，因向中共当局上书“粮食问题”而获罪。2009年，他在香港出版《毛泽东皇权专制主义批判》，书中指出：“中华民族迟早有一天会对帝王文化发起群起而攻之的，再有毛氏复生，也会天下共击之的。”2013年10月，他又在香港出版了《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本质的一致，即“皇权主义者”，邓已成为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一个重要阻碍力量。他批判“六四大屠杀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的倒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尹振环表示，习近平政治左行、经济右行迹象明显，而这也同邓小平路线不谋而合。最要命的是，他还说：“我觉得习近平对我们这些年的经验教训基本上没什么认识，‘党天下’不变，中国还要错很长时间。”尹教授或许可以撰写批判皇权专制的第三部了，书名也可保持其一致性——《习近平的皇权专制道路》。这样，他有口难辨，《西汉竹书〈老子〉注释评介今译》一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显然，老子之教诲，孔子深为信服。他返回后，曾对学生大谈其收获。孔子觉得老子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真是他的老师也！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中国两千多年思想史上的大事。该知道，老子是道家开教宗师，孔子则创立了儒家，儒道两家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若明若暗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那么，现在，中共意识形态管理者对老子“向君上建言”开刀，是要对老子也来个历史虚无主义或更进而掀起大清算大批判吗？看来的确事出有因，按今之标准，老子的确“政治问题”严重。两千五百年前，老子都妄议中央了。说什么“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说什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为而民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独裁者而言的确刺耳。

不过，如要向老子开刀，一开这个头，就不得了。说起来，老子不过提倡“无为而治”，而在两三千年中国思想史上，比老子激烈得多的思想家大有人在。例如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孟子，他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甚至公然呼吁：“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停则易位。”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就更是“严重政治问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完全可以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把有关孟子的书籍全都焚烧掉。

不要以为不敢。不要以为这完全有可能。想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句话，“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结果一大票相关无关的人倒霉，该事件前后株连迫害高达六万人，其中有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的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也蒙冤达十六年之久。而今天，各种各样因文字因言论而获罪事故，不是也时有发生吗？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空

前的大灾难，却被今天毛的追随者美其名曰“艰辛探索”。如何“艰辛探索”？就说文化方面，毛泽东掀起“大破大立”，破“四旧”立“四新”，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破坏殆尽，“发扬光大”的却是其最坏的糟粕——把皇权专制、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度。现在，这个“艰辛探索”看来后继有人。毛的衣钵继承者，拥有“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然意气轩昂，成竹在胸，绝对不畏“艰辛”，绝对敢于再来一次“探索”。罢黜百家，独尊某术，完全能够指日可待。“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及其上级领导这次对“老子向君上的建言”开刀，可谓一个开头。不过，这么一开头，好像已经暴露了党国最高机密。不知这是大罪还是大功？

不得不指出的是，两千五百年前，老子道家核心思想说得明白：“物极必反”，对今天陷害老子穿越“煽颠”之罪者，勿谓言之不预也。

【序 跋】

## 记住本色的陕北往事

——为《精魂》序

王克明

我读《精魂》，泪流满面，为华秋月，这位文革苦难中失去爱情自由的祝英台。宋《义忠王庙记》写梁祝事：“英台遂临冢奠，哀恸，地裂而埋葬焉。从者惊引其裙，风烈若云飞……。”一千年后，华秋月也是这样，在风中，美丽的女人跳进恋人的墓穴，生无法同寝，死一定同穴。

陕北朋友朱占平律师用一生时间写了这本《精魂》。

—

占平兄对我讲过，他年轻时在陕北故乡有一次不可思议的亲历，情节离奇，故事完整，人物惨苦，苦不堪言。他一生深情思念那些相识人物，一生用心书写那段真实往事，因为他曾跪在他们坟前说：“我一定把你们写出来。”

占平兄是中国“枪下留人”第一律师，也是已出版数十万字散文集和长篇小说的作家，这个12万字的故事，为什么却要用一生时间？我想，因为作家在等待自由。

这个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纪实的故事，记述了文革期间一段惊世骇俗的凄美爱情，反映了极权社会中个人的无奈、挣扎和穷途，国共党派敌对给个人造成的严重困境，也涉及国共战争留给双方后人的苦痛，以及对文革武斗的记忆等，还有曾被称为封建迷信的陕北民间多样化信仰和神秘事件。在文学艺术历史使命——曾经叫根本任务——的要求下，这些内容足以定性作品的政治不正确。

文学艺术本来无所谓使命。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千古名篇，都不是因历史使命而传世的。它们之所以永久地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不是因为服务于伟大事业，而是因为作家个人独特的观察思考，和他们自由心灵世界的艺术表达。使命是奉命出使，奉命宣扬，这种目的下，古代产生过一些颂圣作品，与千古名篇传世作品的产生风马牛不相及。作家都去肩负历史使命和整体责任时，会产生统一的写作目的，使文学艺术进入功利主义领域。而文学艺术创作最应该是自由主义独有的领域，是个性的自由创造，是个人情感审美的抒发，最不需要整体、统一之类的概念。如“独上高楼”的寂寞，“衣带渐宽”的孤独，“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期盼，“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慨叹，“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悲怨；又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比喻等等，都离不开一己悲欢的审美意象。因为没有整体使命，因为有一己自由，这些名作才具有永远的生命力。

使命的要求，导致建立政治正确的标准，对作家的写作状态发生影响，形成控制作用。几十年来，占平兄之所以对真实情节取舍不定，绞尽脑汁，瞻前顾后，犹豫困扰，是因为陷在“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个桎梏之中。用这样的属性定义文学艺术，一定得“政治

标准放在第一位”。作家所瞻顾者，便是立场、对象、生活、真实、标准、属性等政治正确的几方面要求。把握了这些要求，文学作品能为统治者乐见，通过审查；离开了这些要求，作品可能无法出版，还可能被指责为负面描述、立场错误、宣扬迷信等。因此，能不能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自由写作，能不能超越那些标准，就成了作家个人在自由和控制之间的艰难选择。

文学具有自由主义本性，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治、表达观念，但不能让它从属于政治、屈服于标准。当占平兄决定“我要做的就是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记述下来”时，他超越了政治标准的制约，打消了被怀疑指责甚至批判的顾虑，改变了写作状态。他不再纠结于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哪些符合了任务要求哪些偏离了使命目的，而是诚实写作：“它原本是平静的，我就记述它的平静，它原本是离奇古怪的，我就记述它的离奇古怪。”如史铁生所说：“不要坚定立场，而要坚定诚实。”一旦做出诚实这个决定，瞬间就解开了几十年的困扰和束缚，他“立刻就进入了写作状态”。“坚持诚实”使作家得到了写作自由，虽然身还在整体使命要求之中，但个人的心自由了，笔自由了。

## 二

1969年前后，文革中积压的几届医学院毕业生，大概95%分配到了西北五省区的乡村基层。我的一位亲属那次被分到甘肃，因出身不好，在贫困地区工作了八年。《精魂》中的爱情主角，便都是那时被分到西北的。

华秋月出身共产党军人家庭，她的恋人陶若松出身国民党军人家庭，他们本有机会一起留在就读的医学院工作，但被华的知心女友出卖，都分配到了大西北，一个新疆，一个陕北。“组织上”刻意使他们相距几千公里，劳燕分飞，认为这样能控制他们爱情的发展，能结束他们的爱情。陶若松在陕北成了备受农民爱戴和敬重的好医生，但受父亲所累，不得已“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

陶若松的父亲、曾是国民党上校军医的陶信哲，收养了抗联烈士、贫苦农民的孤女芍药。无血缘关系的养女在成长期间，对养父的依恋发展成了深挚的爱情。在把婚姻建于爱情基础上的现代性社会，这是可以正常完配的爱情婚姻。但极权年代，人以阶级地位受到控制，国民党军官不能“欺负贫下中农后代”，于是情感因政治限制而不能自主。陶信哲在国民党军队的“学历和军衔，决定了他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能有普通人的尊严”，芍药和他只能在“自由不再，死亡可能随时到来”的时候，“在最绝望的日子里拥有了最值得留恋的人生”。在芍药有孕之后，陶若松为了父亲的政治安危，无奈与芍药假结婚。不料后来因芍药是“烈士之女贫下中农后代”，组织上不准他们办理离婚手续，离婚被视作国民党后代陶若松的“阶级报复”。这个假婚姻制约了陶若松和华秋月的真爱情。

政治力量对家庭婚姻和个人爱情的有效管控，表现出了极权主义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控制。华秋月了解陶若松的假婚姻后，誓言心如石坚，坚定相信未来：“只要我们活着，总会走到一起。”他们远隔天涯，鸿雁传书，把爱寄给对方，像奥威尔在《1984》里说的：“你爱一个人，就去爱他，你什么也不能给他时，你仍然给他以爱。”《精魂》中的相爱恋人，就这样爱到了死。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失去了爱情这个最后的自由，会失去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当陶若松的坟墓被打开，华秋月再也没有什么能给恋人时，她选择了和祝英台一样的结局，把爱的生命给了他。

爱情都能被强权控制，自由哪能不彻底消失？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只有当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靠地受统治，这种权力才有保障。”（《极权主义的起源》）爱情生活被政治权力强拆，职业和生活地点不能由自己选择，年轻的女人如枷锁在身，被迫流放远方。最后，只有爱的生命，可以摆脱这些控制。按组织上的话说，她成了“反动派后代的陪葬品”。

陶若松就是天生便无益于人民的“反动派后代”，更不能选择爱情对象，不能选择生活地点、职业部门，只能被分到大西北“好好改造，争取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父亲陶信哲单位里的文革受益者造反派，欺压“历史反革命”，使他父亲获反革

命罪入狱。又把“反革命家属”芍药驱离当地，遣送到假结婚丈夫陶若松处。由此导致陶若松陷入无法解释无法摆脱的伦理困境，只能以死挣脱。无论他怎样改造，还是被这些无所不在的控制勒紧，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定性结束人生。把身体放在世间，让灵魂摆脱控制，是他唯一能做的自由选择。

### 三

无所不在的政治控制覆盖生活各个方面，甚至民俗。人们为好医生陶若松举办葬礼，被指控为给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后代歌功颂德、“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处理山村“群体性癔症”病情时让风水先生带路进村，以救死扶伤，丧葬活动中有风水先生罗盘定位、摇铃诵咒，都被定性为“扶持牛鬼蛇神，大搞迷信活动”。

这个“群体性癔症”故事，是《精魂》记述的一个真实离奇事件。从贫苦年代至今，陕北乡间时有农民被“亡灵附体”的现象，说是“鬼跟了”，叫做“撞客、发倒”。被“附体”的人做出某个亡人的行为举止，说出那个亡人平时的语音腔调，表达亡人的意志，在旁人看来，便是死魂灵附在了活人身上，从精神意识层面控制了活人。有时，同村年长者与“附体”亡人生前相熟，面对发病者，可直接和亡人对话。乡村医生如用中医针扎患者人中穴位，亡灵会喊叫：“不要扎了，我走也！”“鬼”离开了，病人才会醒来。一些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也了解这种事情。这是陕北时见的“病症”，因无法对亡人意志表达做出解释而具有了神秘性。《精魂》中，一个小山村里九个男人同时在山野发病，没人能控制住他们，这种集体规模，较为罕见。

对这种现象，不论从什么角度解释，症状本身都是真实的，不是贫苦农民装神弄鬼。早在两千年前耶稣时代，以色列先人的艰厄生活中，这种病症就很常见甚至普遍，《圣经·新约》多有记述，不同版本译作“鬼、污鬼、污灵、邪灵”等。如《马太福音》：“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马可福音》：“污灵使那人猛烈地抽疯，大叫一声，然后离开那人。”《路加福音》：“在会堂里，有一个污鬼附身的

人，大声喊叫。”“耶稣治好了许多患病、患疫症和被邪灵附身的人。”《使徒行传》：“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

中国古代也有记载。明《万历野获编》卷28记1567年间一亡魂附体之事：“苏州卫军人丁姓者……与其侪欢饮于舟中，忽作异方语，瞪目改容，切齿恨骂，将自戕。众皆怪问，则曰：我实盗也，与丁同处……”“因自抉其目，拔其舌，狂走经日，始毙于街衢。”与此相似，《马可福音》记：“这个人被污灵附着，一向住在坟地里，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用铁链也锁不住他……他日夜在坟地和山野间大喊大叫，又拿石头击打自己。”

在中国的东汉光武帝时期，耶稣基督在以色列加利利湖一带传道几年，医治了许多这种“亡灵附体”的患者，其中不乏群体性发病。如《马太福音》记：“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路加福音》记：“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与陕北的生活真实比较，可知《新约》记载真实，当时人对病症的认识，与两千年后中国陕北乡间一样。由此也可知，《精魂》记述的，是人类在压力环境中的一种常见病症，不是鬼怪邪魔。千百年来，陕北在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多样化地吸收不同宗教内容，形成了成套的超度亡魂程序，以安抚“孤魂饿鬼”，安定民间生活。这成为陕北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传统社会政权体系之外，有一套成熟、完善和适应忠孝三纲的民间文化体系。现代极权主义强制建立的效忠体系，取代了传统社会依赖的忠孝体系，采用阶级观念层层控制。但是，尽管有破除封建迷信之类的意识形态高压，在效忠体系的外部，社会最底层的底层，依然保有彻底排斥阶级观念的民间文化体系，文化态度也一直保持真诚，安抚孤魂便是。给“反动派后代”陶若松举行传统乡俗葬礼，也是这种态度的表现，结果与阶级斗争、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权利益要求形成了冲突，遭到了整肃。

#### 四



《精魂》所记陕北那次“群体性癔症”的惊人之处，是所有“附体”亡人，都是在国共争雄的陕北战场上阵亡的解放军士兵。当时有的确认战死，有的列为失踪，这两类阵亡者的家人，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年月里，处境有天壤之别。《精魂》记述的山村，有十个男人同时参战，当时确认阵亡的八人，得到了烈士荣誉，家属每月能领六元补助；而列为失踪的两人，属于历史不清，家属没有补助，还受政权歧视，低人一等。其逻辑是，没被定为死亡，就存在开小差、叛变及逃往台湾的嫌疑。

由于父亲属于失踪而不属于牺牲烈士，陕北贫苦农民张宏轩成了出身不好的一类人，遇到难得机会能当工人时，却因父亲失踪的嫌疑逻辑，通不过政审，改变不了命运，精神压力极大。应是与此有关，张宏轩发作父亲亡魂附体的病症时，“父亲”说自己牺牲在战场上没人知道没人收尸，其他战友都在烈士陵园过集体生活，他却抛尸荒野，成为孤魂野鬼，要求找到他的骨殖带回村来安葬。同时发病村民的“附体”者，都是张宏轩父亲的前战友，手下弟兄。后来，因县政工干部说他父亲是叛徒，逃到台湾去了，张宏轩怒不可遏，被捆绑逼疯，凄惨死亡。

陶若松的母亲是国民党军队医院的护士长，也是在陕北战场上失踪的。他父亲因为没有得到过妻子的死亡通知，就多年独身等待，抚养儿子和养女长大成人。陶若松说：“那场战争，带给你们的是一个更换了制度的社会，带给我的却是失去了母亲，以及随后的种种变故。”更换前的制度有阶级阶层，形成于经济关系。更换后的制度，经济上共同贫穷，但政治上严格划分阶级，形成等级差别，通过赋予统治阶级不受挑战的上等地位，阻止社会流动。这样的社会是等级制社会。国共两党战场失踪者的后代，一起成为等级制社会中的低等阶级，吞咽着同样的苦果。

以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名义保持社会等级的权利不平等，是对等级统治的严格维护。因此，“反动派后代”与出身“革命军人”的等级差别，能成为不许相爱的理由；而“反动派后代”与“贫下中农后代”的等级差别，又能成为不许离婚的理由。最没有选择权的人，

是最低等的“反动派”及其家人后代。这一等级的人有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几大类，包括所有在1957年表达过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知识分子。

在等级严格的阶级斗争时代，被称为贫下中农的陕北乡民，并没接受阶级斗争等级观念，对他们眼中从外乡落难到陕北的人，不论是出身各种等级家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还是陶若松这样的低等级“改造”人员，都善良地接纳和关爱。在阶级斗争严酷的岁月里，不幸陷入政治苦难的人，若落脚陕北民间，可能会成为幸事。尽管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但山里乡间没有歧视，更没有压迫。在陕北人眼里，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敌我性质、反动“帽子”，等等这些，统统都是“公家”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外在标志。陕北农民尊重的，不是人的外在等级，而是每个人自身的正义和善良。

## 五

《精魂》文学语言质朴平实，缓缓描述，其中陕北往事却惊天泣地，裂肺撕心。因为对真实生活背景有所了解体验，我更感叹书中男女原型人物的悲惨人生。他们青春风采，却没爱的自由，受强权控制，生命如同草芥。他们都为幸福而来，却都悲苦离去。《精魂》篇幅不长，但反映极权主义统治对社会底层自由的深入危害，如反爱情的控制方式等，却非常深刻。我读这部作品时，心里难过，伤感痛楚，只想质问历史：为什么他们如此苦难？

极权主义强制接受整体幸福——一种政治上的幸福感，宣称未来必然实现广大幸福，一切围绕终极目的，把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彻底整合，以革命的名义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翻天覆地。在“政治挂帅”的方针下，反迷信的结果是建立赴汤蹈火的政治迷信，反宗教的结果是建立顶礼膜拜的政治宗教，反信仰的结果是建立深信不疑的政治信仰，反爱情的结果是建立狂热忘我的政治热爱。连爱情都不能自由，个人还能有什么权利和尊严？还能有什么幸福和自由？人的独立和自由被消灭净尽。

强加的政治幸福带来的是个人苦难。从整体的利益考虑，一个人的苦难被另一个人的幸福抵消即可，也就是低等人的苦难被政治上高等人的幸福抵消掉，社会就等于没有苦难。

因此，只要宣称目的是让多数人得到最大限度幸福，就不必考虑所有人——每一个人——避免最小限度苦难，社会因此没有防止苦难发生的机制。由此而来，个人苦难程度不同地轮番而至，多数人都不可避免。

在世界上消除罪恶消除苦难，是从古至今的理想。两千年前，“柏拉图认为，通过将人放逐到低等阶级并对之实行统治，就能够实现这点。”（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现代的共产主义运动，消除罪恶消灭苦难的方法是，通过摧毁经济体系消灭原统治阶级，把全社会的人都降到经济上的低等阶级，由此实现物质平等。再由极权安排他们的政治等级，进行统治。在消灭财富权利的贫富分化、促进整体幸福的旗帜下，通过剥夺个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各种经济政治权利，实现政治权利的极度的贫富分化，建设并巩固起权利不平等的制度。

按照整体幸福的蓝图改造社会时，不可能把个人自由包含在蓝图之内。即使追求个人自由，也无法实现，其原因柏拉图早说明白：“你是为整体而被创造，不是整体为你而被创造。”（《法律篇》）人类生活中的集体主义追求一直没有放弃这种观念。发展到现代极权主义，全面排斥基本人权，意识形态一元化，个人不能选择居住地和职业的同时，也不能选择宗教，不能选择信仰，不能选择迷信，不能选择思想，连爱情也不能选择，所以《精魂》中的男女如此苦难，能选择的只有死亡了。

多年来，陕北的故事多被红色渲染，占平兄的《精魂》所述，却是难得的本色陕北，郁结着个人深沉苦痛的陕北。这些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我们有权利遗忘吗？“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奥威尔《1984》）忘记苦难，苦难就可能卷土重来。

谢谢朱占平律师让我们记住本色的陕北往事。



【序 跋】

## 思想独立，温故知新

### ——《文革孽文集》序一

印红标

“不平”先生将他在1967年至1972年期间的文稿汇集为《文革孽文集》出版，所谓“孽文”是自嘲，更是对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的讥讽，这本书比2003年出版的文集《挑战毛泽东》收录了更多的资料，为文革时期批评性思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资料。

大约十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馆初次读到“不平”自编的文集《挑战毛泽东》，书中收集了从1967年至1972年撰写的12篇文章。那时我正在修改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潮的书稿，并希望补充新的资料。为发现新资料感到惊喜的同时，作为历史研究者，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文稿可信吗？认真研读之后，我判断这些文稿应当成稿于那个时代。我已经读过一批青年的思想史资料，除了经验性的感知外，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其一，这些随笔、杂文及政论探讨的问题以及思维逻辑，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例如：真理的阶级性问题、模仿鲁迅的笔法等；其二，文章的行文比较粗糙，不够成熟，符合作者自述从高中到上山下乡知青的学历和经历背景，不像有事后进行过重大补充修饰的样子。后来，我得知“不平”是当年一个上海知青的笔名，前几年还看到了手稿原件。

这些杂文、札记、论文记录了1967年秋季群众运动逐渐低落之后至1972年，作者对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抵触、质疑、嘲讽及批判。

作者对个人崇拜甚为反感，针对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写道：“世界上会有这种情况吗？一个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不会有，这种情况过去没

有过，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一定不会有。”他反对“统一思想”，对于林彪所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作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为什么说它是不妥呢？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就因为它不符合辩证法。”（1968年）

作者明确地反对个人崇拜。针对毛泽东与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但需要降温的说法，作者斗胆抗辩：“我看是应当停止了。”（1971年）

作者评论当时无所不在的泛阶级斗争论，说：“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大人们所施订愚民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大人们为了统一七亿个中国国民的思想，为了使中国的老百姓驯服，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理论。”（1971年）

作者尤其关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他伸张言论自由的权利，抨击当时的现实是：“只有某些人把别人打成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别人不被打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只有某些人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自由，没有别人享受言论自由的自由。当然也有自由，那就是思想堕落的自由，那就是当逍遥派的自由，那就是吊儿郎当的自由，那就是浪费国家财产的自由。”（1968年）


在林彪出逃之后，官方的阐释和宣传难于自圆其说，批评性的社会思潮悄然破冰涌动的时候，作者在1972年5月将自认为政治敏感度很低的一篇旧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抄写成大字报，张贴于上海人民广场。大字报贴出以后几小时就被撕去，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也没有遭到严厉惩罚。他所在农场召开了批判会，批判他的观点，未多做追究。自然，从贴大字报开始，他私下里离经叛道的写作也就停止了。

作者是文革期间走向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青年代表。在文革的严酷思想专制统治下，一些青年人，经历了从盲从、迷茫到冲破思想藩篱的过程。在几千万青年之中，这些人是极少数。客观地说，他们中多数思想探讨的深度有限。他们苦苦思考的成果，在后人看来可能只是常识。但那是一个说出真话，说出常识就要付出沉重的、甚至是生命代价的黑暗

年代，能独立思考，发出批判的声音就弥足珍贵。在知识分子被严密看管的漫漫长夜中，他们除了“坦白交代”之外，留下的独立思想遗产寥寥无几。而那些以知青、青年工人等非知识分子身份对本来应当由知识分子回答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虽然稚嫩，却使中国的思想史上不至于留下令人蒙羞的空白。然而至今，中国学术界，对文革历史上闪光的这一页，依旧很少涉及，似乎当时全中国真的只剩下对领袖的歌功颂德或随声附和了。上海学者朱学勤称这些独立的思想者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作者在文革中是孤独的思想者，这本自编文集虽然也难免继续寂寞，但是，它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案例，为后人的追寻，留下了一个“失踪者”的足迹。

作者当年提出的问题是否已经成为翻过去的历史？泛化的阶级斗争论是被放弃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则继续躺在宪法的条文里，等待唤醒。中共中央曾经郑重宣布摒弃的个人崇拜，近年来重新在官媒中游荡，新版的“皇帝新装”似乎已经登堂入室。人们在问：历史果然已经翻篇了吗？

人类进步是不断在前人的知识、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累而实现的，文字和历史学使每一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成为可能。然而，近几十年来，知识被当权者高度管控，民间的体验被选择性封禁，文化大革命时的造反和知青一代不知道十年前右派的言论；八九年的学生昧于年民主墙和八零年竞选青年的思想探索；当代青年尽管有条件从美国或西方吸取自由民主意识，却对曾经发生在脚下的前辈人的五七年、七八和八九年思想一概懵懂。几十年来，民众常常不断重复错误或在思想上原地踏步，对历史的茫然是原因之一。

古人云：温故而知新。人们期待历史悲剧不要重演，希望未来光明灿烂。为此，不遮掩，不回避，真切了解中国人走过的路，十分必要。

2018年7月22日

于北京大学燕东园

【序 跋】

## 文革民间思想的珍贵文献

——《文革孽文集》序二

丁 东

本书是文革期间中国大陆民间思想的珍贵历史文献。作者是一位上海市 66 届高中毕业生。他 1967 年开始独立思考写作，1968 年下乡到上海郊区的崇明农场，1969 年将自己的 53 篇文章汇集成《肥田集》。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他又写作了几篇文章，反思个人崇拜，表达了追求言论、出版自由的见解。1972 年，他将《肥田集》中的一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抄成大字报张贴到上海人民广场，很快被撕掉，他被短暂关押，在农场受到批判，上海市委决定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改革开放后，作者旅居美国，现在已达古稀之年。2003 年，作者以“不平”为笔名将当时准备张贴的十余篇大字报以《挑战毛泽东》为书名在美国出版。

文革年代的民间思想作为文革研究的一个分支，已渐成显学。宋永毅、印红标、钱理群先后有专著问世。我也和朋友合作编辑过一些相关书籍。对不平的文本，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中辟有 5000 字的专节加以评述，将其定位为“自由派思潮再度萌发的早期代表”。不平的文章，共识网也曾予以披载。但总的来说，不平在文革民间思想史上的意义，仍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我想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

其一，印红标的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大陆读者不易见到。而真正关注文革的读者，不在香港，而在大陆。

其二，共识网虽然当时影响较大，但读者更关注其中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史料类的文章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现在共识网已经被迫关闭，不平的文章更不会被公众留意了。

其三，不平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名呈现。人们关注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总是要联系到作者的命运，比如顾准、遇罗克、林昭、王申酉，他们的故事比他们留下的文本更能感动普通读者。而不平以笔名出现，人们无缘通过他的命运故事追寻他的思想观点。

好在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会被时间湮没的。比如不平 1971 年撰写的《论个人崇拜》，今天就仿佛重生了现实意义。他在文章中说：“什么是个人崇拜，就是开动宣传机器，宣扬成绩，掩饰缺点，把功劳归于自己，把缺点推给别人，扩大自己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个人神化，变成救世主。这也就是斯诺所说的个人崇拜吧。如今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已不仅仅是这一形式。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相信某人的话，就是用武力强迫人们接受某人的思想，用反毛、反革命、阶级敌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用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相威胁，以专政包括监狱、死刑作为后备军强迫人们对某人崇拜，这就是斯诺不知道的个人崇拜了。”他还追问：“谁会开动宣传机器，宣传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呢？谁会宣布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呢？谁会把批评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剥夺自由，送进监狱甚至送上绞刑台呢？”他宣告：“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个人崇拜。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一个人有多少功劳就是多少功劳，有多少缺点就是多少缺点，为什么要过分宣扬呢？为什么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甚至动用专政的工具来人为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呢？”不平撰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以及林彪事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林关系开始破裂。毛泽东对美国斯诺说，四个伟大讨嫌，间接流露对林彪的不满。但他又要自我圆场，说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在《参考消息》披露以后，引起了不平的思考。不平这篇文章驳论的对象就是毛泽东的谈话。应当说，不平的观点是有深度的。个人崇拜不存在好坏之分。以暴力为后盾强制公众崇拜掌握政权的领导人尤其可耻。不平的文章当时只能私下保存，不能公开宣传。毛泽东去世以后，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个人崇拜在中国才受到过一次不算彻底的清算。时间走到了 2017 年，个人崇拜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竟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为产生个人崇拜的体制根基并没有改变。此时此刻，展读不平 47 年前的文章，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有时光倒流之感。





## 【书 讯】

## 《文革孽文集》（上下册）在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



本书为作者写于 67-72 年的文章的汇编。包括对文革，对毛泽东，对林彪，对个人崇拜，对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平等，对自由的看法，评论，批判和抗争，以及对林彪事件的反思。可以说是对当局 66 年到 72 年的文化革命理论的大批判，大决战。

1972 年，作者在上海市中心贴出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挑战《5.16 通知》和《人民日报》社论。希望与当局进行理论上的公开对决，公开辩论。由于当局的不接招，作者的企图没能得逞。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手稿得以保存，得以于今日面世。要反思文革，这些手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部分百姓的思想和胆略，而且在很大的一个面上反映了文革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舆论。🔒

【文 摘】

## “文革”时期语言研究

刁晏斌

### 词语的潜隐

文革期间，有大批旧有词语趋于或已经退出使用，进入潜隐状态，其中有一些方面是相当独特的。王铁昆（1988）在谈到文革词语的潜隐时说：“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期间，由于社会的动荡，有为数不少的词语‘来去匆匆’，它们一会儿普遍使用，充斥报刊；一会儿销声匿迹，无人问津。现在想想当时活跃一时的词语，还能回忆起那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苏新春（2002：35—41）对《现代汉语词典》所反映出来的词语潜隐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第二版标明“旧时指”、“旧称”、“旧作”、“旧社会指”以及“旧俗”等的“旧词语”共有944个，约占全部45592个复音词的2.1%。这些“旧词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称谓语（如“丘八、更夫”）、客观类（如“家丁、拍卖”）和主观类（如“妓女、压岁钱”）。标了“旧”自然就意味着后来已经不用了，也就是说，词典的编者认为这些词已经退隐了。

当然，实际上潜隐的词语绝不止这些，词典中反映的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甘祺庭（1980）把“旧词语消亡”归纳为以下六种情况：

- 一是某些直接跟旧制度紧密联系的词语，如“总裁、保长、租界、洋行”；
- 二是指称不符合人民要求的行业和职业的词语，如“当铺、牙行、交际花、娼妓”；
- 三是反映剥削阶级意识和职业歧视的词语，如“戏子、茶房、邮差、脚夫”；
- 四是反映旧的思想意识的词语，如“台甫、令爱、洋房、洋火”；
- 五是反映民族压迫和歧视的称谓，如“满清、归绥（改为呼和浩特）”；

六是因时代不同而废弃或因规范化而淘汰的，如“党团”改为“党组”，“薪水”等改为“工资”。

郭伏良（2001：135—141）比较全面、深入地讨论了旧词衰亡的问题，归纳为旧事物的消亡引起的旧词衰亡、事物名称的改换引起的旧词衰亡、社会发展和交际需求改变引起的旧词衰亡以及词汇系统的调整与规范引起的旧词衰亡等四个方面。

以下，我们按人物称谓类、事物称名类和动作行为类分别对此期词语潜隐情况进行考察。

### 一、人物称谓类

现代汉语中，用于人物称谓的词语很多，这里我们择要讨论。为了对比，我们分为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三个阶段来进行考察，在以下的说明中，我们有时候用“前”、“中”、“后”分别指称这三个阶段。

#### 1. 谦敬称谓语

汉语的谦敬词语非常发达，这些词语在恰当地指称、表情达意以及调整交际各方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和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成为汉语词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最有汉民族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词语。谦敬词语的使用情况在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建国后的日趋萎缩而终于基本潜隐，成为使用范围变化最为突出的一类词语。

刘宏丽（2001）把敬谦词语分为两类，即称谓性敬谦词语和表述性敬谦词语，以下我们就以刘女士所列出的前一类词语（刘书中列出的词语大都取自《现代汉语词典》）为对象，来考察它们在文革期间的使用情况。

谦敬称谓语中发生大面积潜隐的，是含有谦敬语素的称谓语。其中含有表敬语素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尊：尊公、尊甫、尊台、尊翁、尊堂、尊大君、尊大人、尊慈、尊侯、尊君、尊萱、尊上、尊兄、尊嫂

贤：贤侄、贤甥、贤娣、贤妹、贤弟、贤昆仲、贤乔梓、贤伉俪、贤夫、贤郎、贤内助、贤子、贤息、贤叔、贤尊、贤孙

令：令尊、令堂、令岳、令妻、令婿、令郎、令媛、令媛、令兄、令弟、令姊、令妹、令侄、令嗣、令爱、令叔、令甥

以上“尊”类词几乎都已经潜隐，我们在1946—2005年的《人民日报》中逐一检索，仅得“尊甫”1例、“尊翁”2例、“尊堂”1例、“尊兄”2例，均见于文革以后。

“贤”类词语见于《人民日报》中的有“贤侄、贤甥、贤妹、贤伉俪”，其中只有“贤妹”2例见于文革前，其他几个都只见于文革后。三个阶段都有用例的只有一个“贤弟”，但是情况却有不同：文革前后的“贤弟”都是现实中的使用，例如：

(1) 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先生的“贤弟”——那个搞特务工作的，以及被尊称为“善于处理困难问题的能手”的墨菲，在不同的日子里，到过不同的地方，但是，却都碰到了程度不同的霉气。（1958.12.19）

(2) “贤弟！”赵丽蓉握着老农民的手：“欢迎你上北京找大姐来！”屋里又荡起一片笑声……（1991.8.29）

而文革中的7个例子，都见于反映旧时生活的作品中，比如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栾平口中的“胡标贤弟”，所以，这些例子的存在，并不能说明此词没有潜隐。

“令”类词语我们考察了使用相对多一些的几个，其中“令尊、令郎、令爱”都是文革前后均有使用，而文革期间不见用例，“令堂”只有文革后的用例。含有自谦语素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家：家祖、家祖母、家父、家翁、家君、家母、家慈、家叔、家舅、家岳、家兄、家嫂、家姐、家表兄

舍：舍侄、舍表侄、舍妹、舍弟

小：小儿、小犬、小息、小顽、小女、小弟、小妹、小婿、小侄、小甥、小孙

“家”类词语中检索到的有“家父、家母、家嫂”（文革前后有用例，文革中没有用例）、“家翁、家慈”（只在文革前有用例）和“家祖、家叔、家姐”（只在文革后有用例）。另外，“家兄”的用例比较多，但是文革期间仍然没有，我们只在文革刚结束的1977

年见到 1 例，但仍然不是“正常”情况下的使用。为了对比，我们前、中、后的用例一并列出：

(3) 我们家里哥儿五个，我是老五。我跟家兄在金县开了不少年的百货店。(1956. 8. 2)

(4) 内山嘉吉是内山完造先生的弟弟。他在扫墓时说：“家兄遗骨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激励着我们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努力工作。”(1977. 7. 1)

(5) 正是春草初萌时节，家兄归来探家，从旅行袋中掏出两盒东西，说是出差成都买的。(1998. 8. 14)

“舍”类词语中，“舍弟”较多，但文革期间没有用例，“舍妹”只有文革后的用例。

“小”类词语中，“小女、小弟、小妹”文革前后都有用例，文革期间没有用例。

总之，由《人民日报》的使用情况看，含上述 6 个谦敬语素的谦敬称谓语在文革期间已经全部潜隐了。

## 2. 旧时称谓语

据苏新春(2002: 36—38)，《现代汉语词典》第 2 版所收的 944 个“旧词语”中，“称谓”类的有 255 例，占 27%，在他列举的 40 余个称谓语中，以下一些在文革期间的《人民日报》中都未见用例：

清道夫、丘八、堂倌、庶务、属员、通事、侍应生、店东、更夫、推事、捕快、包探、承审员、讼师、军师、督学、录事、弃妇、虔婆、清客、亲随、内掌柜(的)、女公子、晚生、上峰、时人、少奶奶、绅耆、世兄、人犯、票友

这就使我们趋向于认为，这些称谓语在文革期间已经潜隐了。而它们在此前或此后，却都有用例，并且其中绝大多数都经过了“有(文革前)一无(文革中)一有(文革后)”的变化过程。

以上是总体的情况，具体到某一个词语，情况还不完全一样。比如“儒医”，它在文革前、中、后都有用例。此词在批判儒家的过程中遭到“株连”，并由此而得到了启用，关于这一点，《人民日报》1978 年 11 月 2 日的一篇文章说得非常清楚：“林彪、‘四

人帮’顽固地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行歧视、排斥、消灭中医的反动政策。他们肆意践踏党的中医政策，诬蔑团结中西医是保护“牛鬼蛇神”，把中医打成“儒医”、“封建医”，横加迫害。”

所以，就出现了以下的用例：

(6) 他的革新精神同样遭到儒医的激烈攻击。清代儒家陈修园，甚至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掉。(1975. 3. 13)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出于批判的需要而赋予此词贬义的话，像这样的“文词”在文革期间使用的可能性极小。

此词文革前与文革后的用例如：

(7) 极其希望把我所学的技术尽量能贡献出来，因此在公余之暇还时常偷偷摸摸的作一个“儒医”式的顾问工程师，若有“不耻下问”者，我必将我一得之愚尽力的为人民服务。(1956. 6. 28)

(8) 人们会通过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了解到那些“三指温情、两袖清风”的儒医们如何从 50 年代开始出国为许多国家的政要、名流治疗顽疾，获得了常规外交手段所不能替代的效果。(1999. 2. 2)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的称谓语文革期间偶尔也有使用，但却是作为历史词语使用的，由此与前后阶段形成了明显的不同。我们比较以下三例：

(9) 去年夏天，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三个风尘仆仆的解放军来到峡谷里借宿。彭布拉贞叫他们去头人家，说那里房屋宽敞，还能喝上新鲜牛奶。(1959. 4. 25)

(10) 解放前，景洪县广大贫下中农深受封建领主和土司头人的压迫和剥削，贫下中农没有上学的机会。(1976. 1. 17)

(11) 村里的头人卡奥称，拾海物出售是多数村民的谋生手段。(2004. 9. 20)

“军师”在文革前后均有用例，但是在整个文革期间却不见使用，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打倒“四人帮”以后，才开始专用于张春桥，例如：

(12) “四人帮”的黑军师张春桥，曾授意要上海搞所谓“现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1976.11.22)

当时张春桥的另一个“著名”称谓是“狗头军师”。

## 二、事物称名类

相对于人物称谓而言，事物称名类词语更多，基本上也包括两类，一类是谦敬称名，一类是旧有称名。

### 1. 谦敬称名

汉语中长期形成的含有谦敬语素的事物称名有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文革期间也都潜隐了。

含有表敬语素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尊：尊寓、尊处、尊府、尊斋、尊居、尊意、尊论、尊文、尊著、尊作、尊见、尊稿、尊函、尊名、尊姓、尊颜、尊况、尊号、尊恙、尊庚、尊齿、尊体、尊驾、尊便

贵：贵庚、贵姓、贵恙、贵处、贵体、贵宅、贵寓、贵业、贵府、贵方、贵友、贵国、贵报、贵乡

高：高龄、高寿、高见、高论、高意、高名、高谊、高教

大：大笔、大稿、大函、大号、大驾、大名、大示、大寿、大文、大作、大札、大著

惠：惠函、惠翰、惠示、惠书、惠信、惠札

玉：玉手、玉言、玉体、玉音、玉札、玉照

“尊”类词语文革中一例未见，而前后均有用例的有“尊意、尊作、尊稿、尊函、尊姓、尊颜、尊号、尊驾、尊便”，只见于文革前的有“尊处、尊见”，只见于文革后的有“尊论、尊名、尊体”。

“贵”类词语只见于前、后的有“贵姓、贵处、贵体”，只见于文革后的有“贵庚、贵恙、贵友”，前中后各阶段都有用例的只有“贵方”和“贵报”。“贵方”的用例相当多，均用于外交场合。文革期间当然也有一些外交活动及相关的报道，所以此词也不鲜见，

例如：

（1）由于贵方作了一切安排，使这次访问获得了成功，加强了中马两国的友谊和合作。

（1973. 6. 28）

“贵报”在解放前以及文革前后都很常见，而文革期间只有 1 例，且出于外国人的笔下：

（2）对他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请贵报代我表示衷心感谢，并转告他们：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战争暴力，绝不能动摇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钢铁意志和决心。（1967. 1. 25）

按，本文的标题是《胡志明主席致电本报编辑部，感谢我青少年和人民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可见并非“正常”的使用。

“高”类词语中，“高名、高谊”前后都有，只是文革期间没有用例；“高龄、高见、高论、高寿”前中后三个阶段都有用例，但是文革期间的使用与其前后阶段有明显的不同。

“高龄”在文革期间有较多的用例，主要用于毛泽东，此外在一些外交场合等，偶尔也有使用。以下各举一例：

（3）他们说，毛主席那样关怀、重视开展体育运动，七十多岁的高龄还在长江中游泳，真是中国人民的巨大幸福。（1966. 9. 8）

（4）廖承志在宴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宴会，对松村先生以八十高龄，不远千里亲率代表团，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商谈备忘录贸易，第四次来到北京，表示热烈的欢迎。（1966. 5. 14）

“高见”和“高论”在文革期间的不多用例感情色彩都发生了变化：一律用于指斥的对象，大致属于“正话反说”，所以实际上已经赋予了贬义，这样就与前后阶段的使用情况有了明显的区别。例如：

（5）汉弗莱从两方面来发表他的“高见。”第一、他说：“在中国人民中间，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友谊；”第二、他说：“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我们的友好。”有来有往，而不是一厢情愿，汉弗莱说得相当周到。但是，可惜梦呓即使出自美国副总统



之口，也仍然只能是梦呓。（1966. 3. 14）

（6）在这里，群众看到干部不是东跑跑，西转转，“蜻蜓点水，”也不是下来当“钦差大臣，”

“下车伊始”就指手划脚发“高见，”而是群众和干部身挨身，见面又见心。（1971. 5. 15）

（7）苏修的“经济学博士”的“高论”，不就是从帝国主义辩护士那里抄袭来的吗？

（1969. 3. 1）

（8）他们有一连串的娓娓动听的谎话，厚颜无耻的诡辩，侃侃而谈的高论，那词句很有点灿烂夺目，那声音很有点激昂慷慨。可是，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一对照，什么“天才”呀，“一贯正确”呀，就统统现了鬼魅原形。（1972. 9. 1）

按，句中的“高见”和“高论”多加引号，也证明了上边我们的见解。

“高寿”在文革期间仅见 1 例，已经义有所转（义为“寿命长”），用于指物，自然没有什么表敬的意味了：

（9）我们总结出了高寿炉、高拉碳、高温快炼等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并用侧吹转炉冶炼出了六十几个新钢种。（1972. 6. 9）

“大”类词语中，“大稿、大函、大号、大文、大札、大著”等前后均有用例，文革期间不见使用；“大驾、大名、大寿、大作”等文革期间有个别的用例，但是与前边的“高见、高论”等一样，无一例外都是用来表示讥刺意味的，例如：

（10）有一次，万隆一万多群众冒着滂沱大雨聚集在广场等候他讲话，但是，他的“大驾”竟不光临。（1967. 8. 11）

（11）苏修集团的“提纲”和勃列日涅夫的“报告”居然“数典忘祖，”连赫鲁晓夫的“大名”也不敢提，好象在苏联的政治历史中就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臭名远扬的丑角。（1967. 11. 13）

（12）这个一面穷凶极恶地屠杀着中国人民，一面荒淫无耻地庆贺着“五十大寿”的蒋匪军少将，究竟是为为什么而“委屈”和“不平”呢？（1969. 9. 1）

(13)前不久,我们“拜读”了苏修历史学副博士卡拉梅谢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写的一篇“大作。”他在这里摆出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忽然关心起中国人民的生活来了。

按,本文的标题是《揭穿伪善者的鬼话》,可以作为“大作”的注脚。

“惠”类和“玉”类的情况较简单:文革中均不见用例,此前与此后均有用例的有“惠书”“玉手、玉体、玉照”;此后有用例的有“惠函、惠翰、惠示”和“玉言、玉音”。

含有自谦语素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拙:拙笔、拙稿、拙文、拙诗、拙作、拙著、拙译、拙见

敝:敝处、敝姓、敝意、敝宅、敝寓、敝店、敝党、敝号、敝庐、敝国、敝方

愚:愚忱、愚诚、愚计、愚见、愚虑、愚言、愚意

鄙:鄙况、鄙见、鄙姓、鄙言、鄙意、鄙寓、鄙县

贱:贱姓、贱名、贱躯、贱体、贱恙

薄:薄酒、薄礼、薄献、薄物、薄饌、薄酌

“拙”类词语文革期间不见使用,“拙笔、拙文、拙诗、拙作、拙著、拙译、拙见”等前后均有用例,“拙稿”只在后期有用例。“敝”类词语文革期间也不见用例,此前与此后都有的是“敝处、敝国”,此前有的是“敝店、敝号”,此后有用例的有“敝姓”。

“愚”类词语文革期间未见用例,此前与此后均有使用的有“愚诚、愚见、愚意”。“鄙”类词语有用例的只有“鄙见、鄙言”,见于此前与此后,文革中没有用例。“贱”类词语的情况最简单:仍有个别用例的只有“贱躯、贱体、贱恙”,均见于文革以后。“薄”类词语只有“薄酒、薄礼”和“薄仪、薄物”,前两个前后均有用例,后两个只见于后期。

## 2. 旧有称名

苏新春(2002:36—38)所列《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收的944个“旧词语”中表示事物名称的,在“金融商业经济”、“礼俗宗教”、“行政司法”、“文化艺术语言”、“生活”和“婚

姻爱情嫁娶”等类中，以下一些词在文革期间的《人民日报》中都未见用例：

暗盘、押租、脚钱、暗码、银号、银两、奖券、牙行、票号、长支、商情、铺保、头寸、兑换券、社戏、孤哀子、孝衣、宗桃、金莲、天足、铭旌、名讳、红契、囚房、呈文、台端、包银、圣经贤传、破体字、国文、国学、时评、戏码、洋纱、洋布、家政、秘史、揭帖、饭局、外场、红尘、号坎、旗装、扳指、花烛、添箱、艳史

上述词语大多数在文革前后都有用例，例如“红契”和“人犯”：

（14）在新解放区，反动地主不肯把过去霸占的农民的房子腾出来，也不交红契；现在，他们自行腾房送红契，并且糊窗扫地，让农民往里搬，有的则挨门挨户向群众求饶。

（1951.7.16）

（15）近两年全县划给农民 80 万亩自留山（占山场总面积的 28%），把 121 万亩荒山承包给社员，虽然发了三张‘红契（’自留山使用证、承包责任山合同书、司法公正书），但落实中还有不落实的地方。（1984.3.22）

（16）犯上述罪行的侵台美军人员只准蒋帮法院“侦查、”“审判，”而人犯却归侵台美军当局看管。（1965.9.13）

（17）1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人犯和已批准逮捕的人，经审查已向法院提起公诉的人，比去年同期都有明显增多。（1990.6.16）

“秘史”的情况略有不同：单从检索结果来看，各时期均有用例，而文革期间用例也很多，但是只用于一种组合形式，即《清宫秘史》。文革初期，曾经展开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所以它的复现率相当高。下面我们前、中、后各举一例：

（18）这一个私人企业的秘史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左拉小说中的一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1956.8.29）

（19）这两部反动影片，是一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清宫秘史》，宣扬卖国主义；《武训传》，宣扬奴隶主义。（1967.5.26）

（20）这套漫画专集不是畅销书。从销路上看，远远比不上言情武侠小说，比不上明

星大腕秘史，也比不上滑稽幽默连环漫画。（1994. 11. 26）

“脂粉”则又代表了另外一种情况：在文革期间也有用例，但是只用于比喻义，这样就与此前及此后有了明显的不同，例如：

（21）反革命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总是要在紧要关头抹去自己涂饰上去的一层薄薄的脂粉，而露出那一张叛徒的白脸来。（1967. 4. 24）

### 三、动作行为类

#### 1. 谦敬词语

含表敬语素的动作行为类词语主要有以下一些。

惠：惠赐、惠存、惠告、惠顾、惠教、惠借、惠临、惠示、惠允、惠赠、惠予

垂：垂询、垂问、垂顾、垂念、垂爱、垂怜、垂览、垂虑、垂盼、垂注

赐：赐告、赐见、赐教、赐示、赐赠、赐正、赐知

“惠”类词语中，前后有而文革期间没有的是“惠赐、惠存、惠临、惠允、惠赠”，“惠顾、惠示”仅见于文革后。前、中、后三个阶段都有使用的只有一个“惠予”，但是文革期间只用于外交场合，并且都是翻译外国人的讲话，而此前和此后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1）主席先生，你到巴基斯坦的访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我们对你们应我在访华期间提出的邀请惠予光临，感到高兴。（1966. 3. 28）

“垂”类词语前后有而文革期间没有的是“垂询、垂问、垂顾、垂爱、垂怜”，只在文革后出现的有“垂念、垂注”。

“赐”类词语中，前后都有而文革期间没有的是“赐告、赐见、赐教、赐赠”，只有此前用例的是“赐示”，“赐正”只有此后的用例。

与大批含谦敬语素的动词性词语退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组含表敬语素“敬”的词语较多使用，它们的对象，主要是毛泽东，这一类词语有“敬祝、敬献”等。

在 1946—2005 年的《人民日报》中，“敬祝”的用例一共 1347 个，而 1966—1976 年间就占了 835 个，以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例子：

（2）我们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1967. 1. 2）

“敬献”的用例也比较多见，凡是把与毛泽东相关的东西献给别人，或者是把某物献给毛泽东，都经常会用到“敬献”，例如：

（3）红卫兵小将和解放军指战员纷纷涌向前去亲切地慰问，并向他们敬献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章和红卫兵袖章。（1967. 7. 1）

（4）有一次，即将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留阿尔巴尼亚学生决定绣一面锦旗，把自己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心情绣在锦旗上，敬献给毛主席。（1967. 11. 24）

含表谦语素的主要有以下几个。

奉：奉托、奉送、奉劝、奉告、奉送、奉还、奉陪、奉报、奉禀、奉答、奉复、奉访、奉候、奉借、奉恳、奉请、奉扰、奉闻、奉悉、奉邀、奉迎、奉约、奉赠、奉央、奉迓拜：拜托、拜领、拜候、拜会、拜见、拜恳、拜聆、拜纳、拜启、拜受、拜识、拜问、拜晤、拜阅、拜谢、拜贺、拜别、拜赐、拜读、拜辞、拜访、拜服、拜望

谨：谨悉、谨谢、谨谢不敏、谨禀、谨献、谨祝

“奉”类词语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一组在文革期间有较高的使用频率，但是使用范围已经缩小，这一组包括“奉送、奉劝、奉告、奉陪”等，有关情况我们将在第三节讨论；另一组与其他谦敬词语的变化相同，即在文革期间已经退隐，这一组包括“奉报、奉答、奉复、奉闻、奉悉”（以上前后阶段均有用例）、“奉访”（此后有用例）和“奉邀”（此前有用例）。

“拜”类词语似乎更为复杂一点：基本有三种情况，前两种同于“奉”，缩小使用范围的有“拜托、拜见、拜读、拜服”等，与其他谦敬词语变化相同的有“拜谢、拜贺、拜别、拜望”（前后都有用例）、“拜领、拜候、拜恳、拜受、拜识、拜问”（仅见于后期）

和“拜赐”（仅见于前期）。第三种情况是文革期间也有较多的用例，使用范围也没有明显变化，这样的词有“拜会、拜见”，在各阶段都以用于外交场合为主。

“谨”类词的情况最为简单：建国后有用例的仅有3个，其中只见于前期的是“谨悉”，前后都有的是“谨献”，而“谨祝”则前、中、后都有，文革期间只用于外交场合。

## 2. 旧有词语

我们仍以苏新春（2002：36—38）所列《现代汉语词典》第2版收的944个“旧词语”中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在“金融商业经济”、“礼俗宗教”、“行政司法”、“文化艺术语言”、“生活”和“婚姻爱情嫁娶”等类中，不见于文革期间《人民日报》中的有以下一些词：

甩卖、拆账、断屠、上供、温居、拜把子、守孝、打千、吃教、仙逝、路祭、查照、报聘、保结、办差、加委、代拆代行、通经、开天窗、出科、饮场、拉夫、投军、跑江湖、闯江湖、打秋风、缝穷

以上词中，有一些的“陌生化”程度相当高，但即使如此，基本上也是前后阶段有用例，而文革期间退隐，比如“办差”一词就是这样：

（5）因此我在工商联工作中，强调工商联不要变成“办差”机构，脱离了群众，这无异要工商联走上脱离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方向。（1957.7.22）

（6）事实告诉我们，对工作对象有没有感情，做工作是奉命办差还是真诚服务，效果是迥然不同的。（2004.6.8）

表示事物和动作行为的旧有词语以及婚恋类词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文革期间缩小了使用范围，或者是趋于或已经退隐，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第三节还要讨论。

## 四、外来词

外来词语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一种语言中外来词语的多少及其使用情况，不仅反映了该语言的“开放”程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开放”程度，所以，外来词语是一个观察语言和社会以及二者互动关系的很好窗口。

我们以收于《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的标明外来词性质的主要与社会以及人们生活相关的词语为考察对象，这些词语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显示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未见使用，如“布尔氏维克、孟氏维克、普罗列塔尼亚（普罗）”等；二是文革时期不见使用；三是文革时期仍然使用。第一种情况因为无法反映文革期间外来词语的使用及变化情况，所以不予讨论，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后两种情况。

在1946—2005年间的《人民日报》上进行检索，其中此前此后有用例，而文革期间不见使用的有以下一些：

哀的美敦书、安琪儿、白兰地、波尔卡、布丁、布尔乔亚、布拉吉、茨冈人、道林纸、华尔兹、基尔特、几丁质、几维鸟、吉普赛人、喀秋莎、卡通、开司米、珂罗版、克罗米（铬）、雷米封、罗曼蒂克、罗曼司、马丁炉（平炉）、马赛克、曼陀铃、密司脱、密斯、撒旦、塔夫绸、台度、探戈、伊甸园、阴丹士林、孟兰盆会

以下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布尔乔亚”，自从意译为“资产阶级”以后，它就很少使用了，但是即使如此，它也并未消失，只是在文革期间退隐，而此前和此后都有用例，如：

（1）他自己的布尔乔亚的背景，他的费边主义乃至他的作为一个大富翁的立场，在在都成为他的机智和觉悟的严重障碍。（1950.11.2）

（2）在这出戏里，没有布尔乔亚式的浪漫，也没有虚幻空灵的诗章。（1989.9.17）

上述外来词语在文革期间出现“空缺”，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使用了替代形式。这是最为多见的一种情况，主要是用意译形式替代音译形式，如“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卡通—动画”等。由音译到意译，这是很多外来词语都经历过的发展变化，但是建国以后，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排斥音译的倾向，比如《人民日报》1956年8月29日就曾发表署名严秀的文章《从“习明那尔”到“布拉吉”》，对“滥用外来词（按指音译词）”的风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上面这些例子，却证明了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祖国语言文字所具有的表达现代事物和外来事物的可能性，而有些人则拼命地

在那里制造混乱，糟踏祖国的语言文字。”文章在结尾处还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的语言学家、文字改革工作者、编辑和教师们！对这种丑恶的现象进行鞭挞吧！”文革期间，显然延续、甚至强化了这一观念，在反对“崇洋媚外”，批判“封资修黑货”的大背景下，那些有浓厚异域色彩的音译外来词语，自然是能不用就不用了。

二是表达内容的制约。比如“白兰地、波尔卡、布丁、伊甸园”等，虽然并无相应的音译形式，但是仍然不见用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有的外来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或趋于消失。比如，当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吃“布丁”，喝“白兰地”，跳或者看“波尔卡”？即使有，又有谁会去形诸文字，对此加以叙述和宣传？

其二，集体规避。上文提到，在反对“崇洋媚外”，批判“封资修黑货”的大背景下，那些有浓厚异域色彩的音译外来词语能不用自然就不用，而如果某些外来词语不仅在形式上有浓厚异域色彩，在内容上更可以直接归之于“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那人们就唯恐避之不及，自然更不会去使用了，比如“伊甸园、罗曼蒂克、罗曼司”等，大致就是如此。

另外，有一些音译词虽然有了意译的对应词，如“安琪儿、密司”等，但是这些对应词也没有用例，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我们上边所说。文革中仍有用例的有以下一些：

爱克斯光、盖世太保、加农炮、酒吧间、卡特尔、康拜因、莱塞、马达、摩登、摩托、弥撒、木乃伊、那摩温、沙龙、托拉斯、瓦斯、威士忌、维他命、乌托邦、辛迪加

这大致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基本上已经融入汉语，而它们所指称的事物没有其他可以完全替代的名称。这一类词语比较多见，如“爱克斯光、加农炮、摩托、木乃伊、乌托邦”等。

“摩托”义指“内燃机”（见《现代汉语词典》），它的使用情况稍显特殊，主要用于构词，构成“摩托车、摩托化、摩托兵”等，有时也作为“摩托车”的简缩形式，都没有相应的意译或固有形式。文革前，还不乏以下这样“摩托”与“内燃机”互用的例子：



(3)我国第一组柴油摩托双层列车 27 日在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制造成功……这种摩托列车是由两台各六百匹马力的内燃机车和四辆双层客车组成的。(1958. 8. 29)

但是, 文革后在构词和简缩之外, “摩托” 已经被其意译“内燃机” 取代了, 例如:

(4) 这辆汽车前进的动力, 不是来自内燃机, 而是来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来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心。(1966. 12. 1)

“木乃伊” 的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它有时可以与“干尸” 对应, 以下的用例就是用前者为后者作注:

(5) 在法医学上不腐败的尸体有三种, 即干尸(木乃伊), 是在干燥环境中尸体内水分脱失而成, 或由人工应用防腐药品制成……(1956. 8. 31)

但是, 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差异主要有二: 一是产生的时间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第 1 版未收“干尸”, 到第 3 版才收此词, 这表明, 二者产生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二词在《人民日报》的使用情况, 基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木乃伊” 1949 年就有用例, 而“干尸” 的最早用例见于 1956 年。二是表义也有差别。第 1 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木乃伊” 的释义是“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没有腐烂的尸体。比喻僵化的事物”, 而第 3 版中“干尸” 的释义则为“外形完整没有腐烂的干瘪尸体”。以下的用例中, 二者的区别是很分明的:

(6) 过去在古代墓葬发现的完整尸体, 人们最熟悉的是古埃及的“木乃伊” 和我国西北地区的汉唐干尸。(1972. 10. 28)

到了第 3 版《现代汉语词典》中, “木乃伊” 的释义改为“①长久保存下来的干燥的尸体, 特指古代埃及人用特殊的防腐药品和埋葬方法保存下来的没有腐烂的尸体。②比喻僵化的事物”。由此看来, “木乃伊” 的非特指义似乎与“干尸” 更加接近了, 或者已经相同了, 但是, 在实际的使用中, 后者并没有取代前者, 相反在与前者的使用数量对比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二者在《人民日报》的用例数是 137: 34。这似乎与外来词语的发展路径不相吻合, 但却是可以解释的: 一, “木乃伊” 作为一个术语, “占位” 在先(于根元 1996);

二，它的特指义和比喻义是“干尸”所没有的。

“瓦斯”似乎又代表了另外一种情况。

各版《现代汉语词典》“瓦斯”的释义是“气体，特指各种可燃气体，如煤气、沼气等”，此词用的通常是特指义，这样，有时就与“煤气”形成了对应关系，如“天然煤气”又叫“天然瓦斯”，“（煤矿）煤气爆炸”又叫“瓦斯爆炸”等。但是，“瓦斯”与“煤气”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所以二者不可能完全对应，如“催泪瓦斯、毒瓦斯”等中的“瓦斯”，就不能用“煤气”来取代，而“煤气公司”一般也不叫“瓦斯公司”。所以，在1966—1976年的《人民日报》中，“瓦斯”与“煤气”的用例数是450:275，除去一些含“瓦斯”的外国人名（如“科瓦斯”），二者的数量之比大约是350:275。

第二种情况是用于指称域外人、事，且没有相对应的意译形式的。这种情况最多，如“卡特尔、酒吧间、辛迪加、威士忌、弥撒”等。即使在文革期间，有一些文章还是会涉及到国外的一些人或事，这就使得这些词语获得了使用机会，虽然用例都不太多。例如：

（7）当天晚上，突击队又用炸药炸了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家大酒吧间，炸死炸伤在那里的二十五名以上以色列侵略军。（1968.8.15）

（8）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建议“共同市场”六国的汽车公司成立一个西欧汽车卡特尔，来对付三大美国汽车公司的竞争。（1970.2.22）

（9）每逢礼拜、弥撒和宗教节日，教堂里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婚丧喜庆仪式在这里举行。（1976.1.29）

第三种情况是音译意译各占半壁江山，二者并存。这一类中最典型的词是“马达”。

《现代汉语词典》1—4版“马达”的释义是“电动机的通称”，第5版改为“电动机”。按，英语的motor在汉语中基本分化为二，即“摩托”指内燃机，“马达”指电动机。“摩托”的使用情况见前，“马达”与“电动机”在1946—2005年《人民日报》中用例数是2991:2458，其中1966—1976年间的用例数是355:480，反映了无论是在大的时间段还是小的时间段内，二者都基本持平。

至于为什么“电动机”没能最后取代“马达”，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这里我们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对上述“马达”与“电动机”的对应情况不应当绝对化。有时“马达”并非指电动机，而是发动机，并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如：

(10) 刚挖了一半，坦克的马达声就从背后响起来了。(1954. 1. 24)

(11) 六时，飞机的马达声远远传来。接着，敌人的侦察机在公路上空出现。(1966. 8. 7)

第二，与三音节的“电动机”相比，“马达”显然占据音节上的优势，这应当是它能够占据半壁江山的原因之一，比如常见的“马达隆隆、马达轰鸣、马达欢叫/唱”以及“马达声声”等，就基本没有用“电动机”替代的形式。

第四种情况是用作或用于批判的对象。如“沙龙”和“摩登”都是因此而得到使用的。

第1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沙龙”的释义是“十七世纪末叶和十八世纪法国巴黎的文人和艺术家常接受贵族妇女的招待，在客厅集会，谈论文艺，后来因而把有闲阶级的文人雅士清谈的场所叫做沙龙”，由这一释义看，其感情色彩是中性趋贬的。在文革以前，“沙龙”中性的用例虽然常见，但偶尔也有趋于贬义的用例，如：

(12) 如果没有了群众化，民族化不过是复古而已，革命化也成为沙龙里的东西。结果导致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的复辟。(1964. 6. 29)

而到了文革中，几乎都是这样的意义了，例如：

(13) 在版画系画室中，公开贩卖马蒂斯、毕加索的野兽派艺术。在画室外又成立小沙龙，以二十世纪没落的资产阶级艺术为追求的榜样。(1966. 7. 16)

(14) 对高尔基来说，当时他的阶级兄弟在哪里？不在他的翻译文学编辑室里，不在他近旁那些阴暗的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工厂，在农村，在前线……(1975. 4. 6)

“沙龙”的意思无法用意译词来表达，所以只能用这一原有的音译形式，而“摩登”却与此不同：它有同义的汉语固有词“时髦”（《现代汉语词典》就以后者来解释前者），二者在10年文革的《人民日报》中用例数为12:55，一律都用于指斥和批判的对象，含

有明显的贬义，例如：

（15）苏修共青团在推销西方时装和摩登发型方面也不遗余力。在不少地方公开设有“共青团美容室，”研究资产阶级发型。苏修叛徒集团千方百计把共青团变成为贩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俱乐部，以便为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效劳。（1968.12.12）

（16）这就使人们联想起在莫斯科上演的尊孔丑剧。那里的摩登“圣”徒们是怎样虔诚地拜倒在孔老二脚下，高唱什么“至圣先师”等肉麻的赞美诗啊！（1976.1.31）

（17）我们一定要象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坚决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不管它披着怎样时髦而华丽的新衣。（1967.6.11）

文革中固有词“时髦”没能取代外来词“摩登”，与以下两点有密切关系：

第一，此期有一些系引用前一阶段的作品或提法，前者如建国前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后者如孟子曾称孔子是“圣之时者”，而鲁迅把孟子的话翻译成“摩登圣人”，这在“批林批孔”时也被人旧话重提。

第二，我们注意到，除了引用外，在现实的使用中，“摩登”一律用于外国的人、事，这或许是因为有浓厚外来色彩的词用于外国的人事，二者更为协调一致；“时髦”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如果这不是巧合的话，那么就只能说二者已经有了互补分布的趋向。

第五种情况是偶尔的使用，比如“维他命”，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仅有2例，即：

（18）我再三求他帮助，他只开了几支安乃近和维他命，就把我们推出了大门。

（1969.11.15）

（19）目前，这家制药厂已经能够自行配制和生产奎宁、青霉素、多种维他命等四十多种药品，还能配制虎骨膏、象骨膏等药品。（1975.1.6）

以上两例都不是用于“国内”的，前一例是一位也门患者的自述，而后者则是叙述越南北方一个制药厂艰难历程的，我们还不能确定“维他命”的使用与此是否有关。同期“维生素”的用例共有1716个，二者相比，前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康拜因”在文革期间也只是偶尔使用。各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此词的释义均为“联合机，特指联合收割机”，这也就是说，音译的“康拜因”有两个相对应的意译形式。三者在1946—2005年《人民日报》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康拜因：共354例，其中1966—1976年间4例，指联合收割机3例，指联合机1例  
联合机：共625例，其中1966—1976年间31例  
联合收割机：共1288例，其中1966—1976年间86例

很显然，文革期间是趋向于用“联合机”和“联合收割机”取代“康拜因”的，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用意译取代音译，符合“时代潮流”，二是表义更加明确和准确。

最后附带简单谈一下字母词语的使用情况。建国以前，各种形式的字母词语相对比较多见（刁晏斌2006：263—264），建国以后则趋于退隐，比如上文提到的“爱克斯光”，它的字母词形式“X光”在60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出现了207次，只有1例见于1950年，其余206例均见于1979年以后；“爱克斯光”一共出现了193次，其中见于1976年以前的共有165例，两相比较，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 参考文献

陈建民 1999，《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戴昭明 1996，《文化语言学导论》，北京：语文出版社


刁晏斌 1995，《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2006，《现代汉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甘祺庭 1980，《三十年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概述》，《广西师院学报》第1期


郭伏良 2001，《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刘宏丽 2001，《现代汉语敬谦辞》，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苏新春 2002，《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王铁昆 1988，《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语文建设》第1期  
于根元 1996，《说“友”》，《语文建设》第3期

## 【读者来信】

### 1. 郭予庆更正


《记忆》257期刊发的拙文《建国初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构想的提出与终结——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辨析之一》，有一处误植——第23页，倒数第8行：“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十年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该日期应为（1952年9月24日），请予以更正。

### 2. 林洛纠错

《记忆》257期“域外之音”专栏中的林洛一文，原标题为“斯格拉斯堡，铺设第一批绊脚石纪念纳粹受难”。编辑将它改成了“法国艺术家为纪念纳粹受难者，在斯格拉斯堡铺设第一批绊脚石”。这不但画蛇添足，而且张冠李戴。事实上，铺设绊脚石的艺术家是德国人，叫冈特·德姆尼希，不是法国人。

### 3. 读者谈本期封面——“绊脚石”的设计

“红玻璃”的设计别出心裁，不但引人注目，而且简单易行（粘在窗玻璃上就可以了）。邹行的设计是对西方艺术家的突破。从他写的《血色碎片》一文中，可见其高度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心。赞！（皮皮侠）

“红玻璃”的设计，让我在黑暗之中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看到它，让我想起了台湾纪念“二二八”的尖塔。中国何时允许“红玻璃”出现，是个未知数。可能允许的那一天，这位孤独的设计者已经羽化西行。但是，他的构思，他的作品留给了历史，相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人会把他的奇思妙想付之实现。（燕军）

#### 4. 越人对《大抓“五一六”的来龙去脉》一文的不同看法

本期记忆中评论栏目中《大抓“五一六”的来龙去脉》一文，读后有些不同看法，简述如下——

该文在论述周恩来与抓“五一六”关联时，提到“周恩来鉴于历史教训，曾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时明确指出：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11月3日，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时，也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不要扩大化，不要弄得什么地方都有‘五一六’”。这样仅根据少数史料论断周对于抓“五一六”的态度恐怕未必准确。因为我们很容易从文革史料中举出不少反例。例如，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就清查“五一六”问题这么说到：

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

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1969.9.20晚），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与康生、江青在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就五一六问题发表意见：

“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01.2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很显然，周在这两篇讲话里对于“五一六”问题是强调搞深搞透而不是反对扩大化。



而在周一手负责的外交部抓“五一六”运动中，周的态度更为明显，197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就清查“五一六”问题发表了专门指示：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

在外交部已经整出1500-1700名“五一六”分子，占到文革初期参与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杨荣甲：《共和国外交部秘辛》，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周却认为“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对于外交部抓“五一六”存在的种种问题没有任何反思或批评。相反，周在讲话中继续为外交部的抓“五一六”运动打气：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

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为。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五一六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周恩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01.2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一些对于外交部抓“五一六”运动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存在扩大化的外交部干部如李耀文、郑为之、张燕龄等人（郑曾向周当面汇报他对清查五一六的意见，张燕龄则写信给周恩来反映问题），或被外放，或者从此不受信任，而在清查中表现积极的姬鹏飞、马文波等却被重用提拔（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256-257 页）。

上述史料，都显示出周恩来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复杂。另外还要指出的，把周和中央文革描述为文革中正确或错误的两级分法是以往文革史传统叙述中常用的，但也是不太靠谱的。比如陈伯达在 68 年 12 月 17 日和谢富治一同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成员时就说：“（‘五一六’成员）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第 1 期，第 41 页）

另据何方回忆，“一九六九年周恩来就全面铺开了抓“五一六”运动，他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抓“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倾向时，他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98 页）



#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http://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 二、定制服务：

###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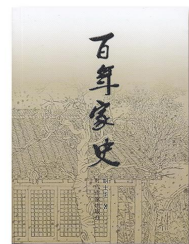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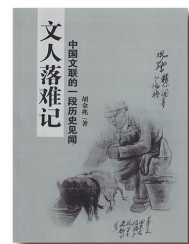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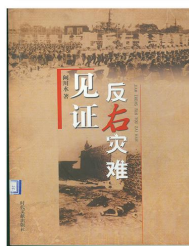
##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http://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 【本刊聲明】

##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